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1月31日第2期

总第148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48期

目 录

【专 稿】

薛声钦 阿陀 广东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的升沉轨迹

张业赏 从学术争议到政治批判——从山东对《海瑞罢官》的讨论看文革的发动

【大饥荒】

陆 凌 一九六零年(三)——与苏联无关

【述 往】

慰 祖 家世拾零(二)——我的爹爹和父亲

王丕忠 镇反纪实——我的劳改三十年(四)——皖北治淮

王金锐 我的自述(一)——十年苦难

【资 料】

1. 北京市革委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1967. 04. 21)

2.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7. 08. 13)

【读者来信】

1. 王复兴更正声明 2. 张晓良纠错

【本刊声明】

【专稿】



薛声钦, 1940年4月出生于广东汕头潮南区峡山沟头村。1962年7月毕业于广州市广东省机械学校机器制造专业, 同时入广州市广东渔轮厂当工人, 政治干事, 1965年10月任厂团委专职副书记; 1967年4月, 由“文革”群众组织推选为“工联”区负责人, 8月调入“广州工联”总部勤务组;

1968年2月, 任广州市革委会常委; 1973年后兼任广东省总工会常委, 厂工会副主任, 增城县朱村公社党委副书记, 广州市机电工业局党委常委、局革委会副主任; 1983年8月任广州重型机器厂工程师; 1989年初任广州市食品工业开发中心工程师; 2000年8月退休在家。所著文革回忆录《十年人生梦》一书, 2007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阿陀(谭加洛), 1950年出生于广州市。原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 现居美国。经商之余从事文革研究。

1996年发起组建“芝加哥文革学会”并被选为会长, 活动包括: 组织芝加哥地区“纪念文革三十周年座谈会”; 在芝加哥大学等地组织多次小型学术研讨会; 先后访谈过陈若曦、林美霞、宋永毅、刘国凯等人。2005年开始研究广州文革; 2007年发起创办《广州八中文革网》。调查广州文革悬案和知青偷渡史等, 访谈过数百名文革当事人, 其中包括十多位广州文革主要群众组织头头。2008年发起建立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地方文革史交流网》; 曾往多伦多、纽约、香港、北京、武汉、长沙、南宁和深圳等地追访文革人物; 目前正在做“北航黑会”的研究。2014年在香港中大访问期间, 主持召开粤港两地编写《广州文革大事记》座谈会。研究文革成果主要发表在《今天》、《记忆》、《昨天》、《羊城晚报》、《炎黄春秋》以及美、澳的华人报刊杂志和互联网。主要文章收录在博客“福尔摩斯陀” <http://blog.sina.com.cn/u/2388286230>

广东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的升沉轨迹

薛声钦 阿陀

1967年2月24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正式宣布定名之后，其他省（市）也都通过以解放军、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方式，朝着毛泽东指明的“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叫革命委员会好”这个方向前进。一年以后，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在广州市越秀山体育场召开十万人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广州市革委会也同时宣布成立。

由这时开始，一批群众组织的代表相继进入省、市一级三结合的“新生红色政权”，这些群众代表的个人命运也不由自主地随着历史的大潮升降沉浮，其轨迹大概梳理如下。

第一阶段：进入革委会前后积极参与工作

1967年秋季两派大联合以后，随即筹备成立省、市革委会。1968年初，主要群众组织的代表正式进入“三结合”的新领导班子，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新政权的各项工作，这个最初磨合期约半年。

1、协商筹备

在省革委会成立之前，先有个“省革筹”的过渡。

1967年11月2日，中央《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宣布成立以黄永胜为首的军队和地方干部以及大联合后的群众组织代表组成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省革筹）。省革筹协商小组约40人，其中两派群众代表约20人，于1968年1月初开始工作。当时的任务主要是协商省、市革委会组成人员和分配比例。其中群众代表委员名额是由省革筹小组统一协商分配比例，分到群众组织后再由该组织推荐协调具体名单。群众代表委员名额分配

上侧重于工农界别，工农的比例较大。两派代表分配表面上按“一碗水端平”的原则进行，但实际上端不平。参加协商小组的群众代表不但要为本派争名额，还在协调推荐解放出来参加省、市革委的干部名单上针锋相对。协商的程序，首先由省、市军管会组织介绍被推荐领导干部的革命经历和历次政治运动的表现，然后逐个评议，逐名协商，两派为了争取各自推荐的领导干部，经常斗嘴吵架……

1968年2月20日，省革筹协商小组最后一天在广州先烈路广州军区第一招待所召开会议，由原（代）省长林李明等4位老干部痛哭流涕检讨亮相，然后群众代表评议讨论是否可以出来工作。当时多数人满意，少数人反对抗议。下午5时，黄永胜宣布省革筹小组工作告一段落，经中央批准，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将在明天宣布成立。广州市革委会也将宣布成立。

2、“群众代表”正式进入省、市革委会

广东省革委会首届委员180人，¹其中属广州的群众代表22人，名单如下：

学生代表5人：常委4人：武传斌、高翔、林昌文（3人红旗派），易作才（红一司）；委员1人，梁仲文（红旗派）。²

工人代表14人：副主任刘继发（红旗派）；常委4人，丘学科（红旗派），梁锦棠、莫超海（2人东风派。梁锦棠9月升副主任），刘均益（工交红旗）；委员9人，莫竞伟、陈振球、罗泽权、邱长青（4人红旗派），赵正业、黄强英、欧阳武、杨庆祥、（4人东风派），潘汝升（工交红旗）。

农民代表2人：常委梁秀珍（东风派，9月升副主任），委员罗××（红旗派）。

机关代表1人：委员周焱（红旗派）。

首届省革委会常委一共33人（另有6名待选代表未计），其中军队9人，干部10人，群众14人，群众代表的比例看起来不小，但省革委会常委内还设有一个7人的“党的核心小

¹ 资料来源：广州党史网 <http://www.gddsw.com.cn>

² 广东文革两派分别为“红旗派”和“东风派”。前者是出自于周恩来1967年4月接见讲话中肯定了中大红旗、华工红旗和广医红旗这“三面红旗”是造反派的代表。后者出自于4月后两派对广东军管3月军管的不同评价，造反派认为是“黑云压城”，保守派认为是“东风浩荡”。另军管会认定的中间派为工人组织工交红旗，大学生组织红一司。

组”，由5名军队干部和2名地方干部组成，没有群众代表。

广州市革委会的成立，与省革委会成立须直接经中央批准不同，它是在省革委会宣布成立之后，随即当场宣布经省革委会批准成立的。

广州市首届革委会委员100人，¹其中属广州的群众代表30人，名单如下：

工人代表24人：副主任孙亦武（东风派）；常委4人：薛声钦、潘成德（2人红旗派），简少泉（东风派），毕波（工交红旗）。市革委委员19人：罗应尧、李选松、林丽台（女）、陈番禺、陈锡龙、卢良雅、陈宝×、易其茵（8人红旗派），陈坚松、吴文彬、张永立、王冕、张树雄、关驹、吕坤庆、×××（8人东风派），冯景成、黄家沂、温永（3人工交红旗）。

农民代表6人：副主任钟叙本（东风派），常委陈×满（红旗派）。委员4人：林细钊、林××（2人红旗派），张伯辉、王××（2人东风派）。

中学生代表因两派名额分配争持不下，暂由中学红代会派代表列席市革委会议（省革委会学生代表在大学生中推选，市革委会代表则是在中学生中推选）。

首届市革委会常委共29人。党的核心小组由军队和地方干部八人组成，没有群众代表。

3、省、市革委会初期的工作

大联合组建革委会——

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下级单位尽快实现大联合，成立各级革委会。

越秀山成立大会后，省、市革委在越秀宾馆召开全会扩大（厅局军代表）会议，研究贯彻中央有关大联合和斗批改问题。市革委会层层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促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从2月至3月底，全市共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共1.3万多期，参加学习的人数达140万人次。²群众代表各自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极小数常委抽调参加省、市革委大联合工作组，

¹ 资料来源：广州党史网 <http://www.gddsw.com.cn>

² 资料来源：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二节市革委会的成立及其工作》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922/01/23969_237499514.shtml

奔赴各地筹建革委会。3月上旬，市革委主任黄荣海，指定孙亦武和薛声钦陪他在人民中路市委招待所，协助接待花县、从化县两派群众代表，协商成立县革委会。3月底，市革委办事组通知薛声钦参加市财贸武装部大联合工作组，担任副组长进驻广州市肉食供应站，10月成立站革委会。

稳定秩序恢复生产——

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市革委会于8月在原市军管会建立的“三结合”临时治安委员会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充实，成员由军队代表、群众组织代表和原公安人员代表组成，以后各区、街层层组建了这种机构，具体任务是组织队伍巡逻，收缴散落民间的枪支，维持社会治安。在此之前，还组织起广州工人纠察队。

市革委为了保证全市猪肉供应，稳定社会秩序，于1968年3月派工作组进驻曾发生过武斗，两派对立严重的市食品供应站，实现大联合，建立革委会。市革委会工作组组长是原市财贸武装部谷吉祥政委，武装部高部长和薛声钦分任副组长，加上组员（6名武装部部队干部和5名原市人委处级干部）共14人。

政审及清理阶级队伍——

省、市革委会成立不久，就由政工组秘密针对群众代表亲属及社会关系进行政治审查。1968年4月初，市革委政工组通知广州玻璃厂革委会：“经市组织组审查，易其茵同志有亲属在台湾，省革委会决定取消其广州市革委委员资格，并通知其本人。”

5月，在市革委常委会上，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吴润（广州军区军事法院院长），向常委会报批，市革委委员林××（从化县农民红旗），以强奸罪判处5年徒刑。

6月中下旬，广东省革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学习，并发出关于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通知，广州市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从此逐步展开。

根据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资料——

7月23日至10月，全市共举办了两期中小学校教职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3.08万名教职工参加学习。在学习班中被批斗者共3693人，（其中中学2056人，小学1637人）。

他们分别被扣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顽固不化的地方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现行反革命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家属”等帽子。

与此同时，市文艺系统、公安系统和原市人委机关和各区、县、局、公社、大队等层层举办以“清理阶级队伍”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7月至10月，全市从党政机关到各基层单位，共举办规模、时间、形式不等的学习班2.83万期，参加人数达216.78万人次。遭揪斗的达28738人。其中有49名为中上层爱国民主人士，他们被加上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等罪名，遭到搜捕和拘留。至年底，已结案或基本结案的只有7125人。越秀区1969年3月统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共揪斗1886人，已定案处理303名，属人民内部矛盾的703名，尚未定案880名。“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虽然运动清理出一些有打砸抢行为的犯罪分子，但同时乱打乱斗、“逼、供、信”的现象屡屡发生，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据市革委会的统计，1968年7月至12月，全市非正常死亡达585人。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归侨、侨属以及有海外关系的人深受其害。一些人被迫转行，下放劳动，甚至开除公职。¹

在清队运动中，进入新政权的两派群众代表都积极配合参与各项工作。

根据市革委会副主任钟叙本回忆，他和梁秀珍、孙亦武三位东风派的工农代表，当时是被指定负责组织“工人、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大、中、小学。²

旗派的市革委常委薛声钦5月随工作组在食品站开始搞“清队”，其中一个案子闹得很大，是食品站工程师，技术股长黄世炎（红旗派）因为肃反时的特务嫌疑问题被重新翻出来，由财贸部武装人员逼供讯三天三夜，入狱一年多，后送梅县农村下放插队，家属也被株连，6个子女先后去新兴县上山下乡后偷渡香港。

还有参观推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献忠心”运动，慰问参加“三支两军”的解放军等。

¹ 资料来源：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二节市革委会的成立及其工作》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922/01/23969_237499514.shtml

² 资料来源：《钟叙本口述历史：我任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经过》天河区地方志办公室蔡维朗、中共天河区委党史研究室覃卉 <http://www.gzsdfz.org.cn/>

总之，这一阶段省市革委会的各种活动，群众代表参与度较高，除了主要协调推动基层两派大联合，组建革委会，还比较全面地参与了各种政治运动和一些行政生产管理工作。

第二阶段：1968年秋清查运动后一派代表名存实亡

1968年7月底贯彻中央两个布告后，部分（造反派）群众代表被批斗收押审查，代表身份名存实亡；同时还有另一部分（保守派、中间派和个别造反派）代表继续参与各项政治运动和日常工作。这种情况持续数年，直到71年“9.13事件”后的第三年才有所变化。

1968年夏天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很快和贯彻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及9月掀起的“清查5.16”运动重叠，以各种名义清查打击造反派。秋天，广东省各级革委会相继成立，群众组织山头陆续被铲除，省革委随即向所谓“5.16反革命集团”发起进攻，掀起声势更为浩大的群众运动。省、市革委政工组对原红旗派委员全面清查，重点造册整理材料，不少人被押送警司、工纠或单位设立的“牛棚”审查批斗。

省革委常委丘学科（工农联）被省建一公司关押“牛棚”数年。省革委委员邱长青（海员红旗），被省航运厅军代表以莫须有的“电台问题”（把用于航运生产的电台说成特务电台、帮派服务电台）关入“牛棚”多年。市革委委员卢良雅（省航修厂红旗），被厂革委以牵涉“5.19”省总工会武斗事件为由关入“牛棚”。省革委委员罗泽×（市汽修厂红旗），市革委委员陈宝×（华侨糖厂红旗）等，都先在单位“牛棚”关押，后关进市公安局。市革委常委薛声钦（省渔轮厂红旗）自1969年起，一度不再被通知出席市革委的常委会议，外事活动也不让参加，连省“工代筹”大楼轮值办公工作，所在单位渔轮厂革委会也不放行……

当时进入省革委的学生代表，大多数回到学校毕业分配。

新一司司令中山医学院的林昌文被分配去湖南省山区。

三司司令华工高翔1968年8月被押回学院接受批判和审查，全院大会批判和揭发的三

个主要问题是1、与旧省委的关系；2、为地方主义翻案的问题；3、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1969年1月底，高翔在学校的审查结束了，被分配到广州军区在湖南省的江永生产基地，接受解放军再教育。因为离开了广东，所以被免去省革委常委的职务。1970年3月，从部队农场再分配到广东省翁源县农机修造厂工作。被告知只能当工人，而不能像别的大学毕业生那样分配当技术员。工作以后，还被告知不能离开翁源。高翔这才知道，其实自己还在广州军区的控制之下。主要原因可能是为地方主义翻案的事情还未了结。

广东文革造反派中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是红司司令中大武传斌。他在1968年7月底即因在北京主持“北航黑会”，¹被拘捕交省革委扩大会议600多人批判，后交中大全校大会挂牌批斗。罪名先是组织“反共救国团”，后变成“5·16反革命集团”在广东的代表。从1968年7月底到1969年初，大约半年多时间失去自由，前段是被关押拘留所，后留校关“牛棚”，还短期送郊区交联星大队贫下中农监督劳动。1969年春，武被送到牛田洋军垦农场劳动，因表现好，成为活学活用毛著的标兵，回广州“讲用”。1970年3月结束劳动，被分配到紫金县烧碱厂当技术员，但同年底又被关入正式监狱“柯木塱看守所”，时间长达一年半，1972年中放出来后转送中大软禁，继续审查，直到1973年底才放出回到紫金。

这个阶段省、市革委会的造反派群众代表大部分受到整肃，但是在关押批斗的同时，他们的代表身份还是保留了，只是名存实亡，以后数年不再参与任何会议和工作。也有个别别人一直留在领导班子内。据黄永胜秘书迟泽厚回忆，在贯彻两个报告以后，一些军队支左干部曾提出趁势把各级革委会的造反派代表清除出去。当时广州军区政委，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坚决不赞同，认为革委会保留几个代表有利于团结一派群众。²市革委会常委薛声钦虽然受到冲击，但一直还保持常委的身份，参与一些工作，也曾参加过有外宾出席的省市国庆宴会。本人认为主要原因是其没有直接参加过武斗，同时，在学时当过坦克兵，既是工人代表，又是工人干部出身，加上性格温和，两位书记焦林义和梁湘印象比较好，愿

¹ 所谓“北航黑会”，是指六八年七月十八、十九日由广州红旗派头头武传斌在北京航空学院主持召开的全国造反派座谈会。几天以后，七月二15日周恩来、康生等接见广西两派时，把北航会议定为“黑会”，严厉追查。

² 迟泽厚《非常真相》，第130页——香港，知青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出版。

意使用。薛声钦印象比较深的三件事是：

(1) 1969年初和1970年初两次作为全市活学活用毛著积极分子分子和先进单位代表出席大会并参加“积代会”主席团工作，推动掀起“忠字化”运动高潮；

(2) 1971年7月到市委党校参加市处级干部以上“批陈整风”学习班1个月。作为群众代表的市革委委员（时称新干部）大部分出席，但此时市革委群众代表范围已扩大，除了原来的老委员，1969年以后又陆续“掺沙子”，加入了许多被认为文革中没参加群众组织，没有派性的新委员，他们包括劳动模范贾大水，英雄人物家属向秀丽母亲，军烈属后代和一些中学生代表等，加上增补的老局（处）级干部，参加学习班的总人数达300多人。

(3) 1972年5月被以市革委会工作组副组长的身份派往广州市房管局解放南（似少个街或路字——编者）房管站领导清队运动。

第三阶段：批林批孔后“补台”

1971年发生“9.13事件”。从1973年开始，有的被关押审查代表被重新安排工作；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后，所有代表处境都有不同程度改善；75年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后，代表的地位又有所提升。这段时间是代表们普遍感觉的相对宽松的时期，约持续两三年，直到76年毛泽东去世。

1973年2月，高翔被广州军区政委，省革委第一副主任孔石泉单独召见谈话，鼓励他吸取教训，重新振作起来，他马上意识到4年半的审查终于告一段落。当月，高翔即出席了韶关地区共青团团代会，并当选为团地委常委。5月，结束了8年的党员预备，转为中共正式党员。随后又提为翁源县工交办副主任。

6月，省革委副主任，省委书记王首道和广州市书记处书记梁湘派省市组织部门人员到省渔轮厂关切薛声钦的入党问题。一个星期后即填表成为中共党员。

8月，（5月份进京的）王洪文在十届一中全会上被宣布为党中央副主席，这对各地造

反派地位的提升有间接的影响。

年底，前后两次连续关押，已经失去自由整整三年的武传斌，从中大被送回紫金烧碱厂，即由技术员提升为厂长，同时自动回复了省革委会常委的身份。

1974年4月，高翔和武传斌被召回广州，参加由新领导班子赵紫阳和许世友主持的省革委扩大会议。会后，4月22日赵紫阳单独召见高翔长谈，并通知他恢复省革委常委职务。

与此同时，广州掀起“批林批孔”运动，原红旗派和东风派头头，包括“在朝”（结合入革委）和“在野”（未入革委）纷纷集结串联。当时旗派在各级新政权里的代表已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东风派虽然在革委会里的人数较多，但也觉得群众代表不被重视，没有实权。原红旗派的省革委副主任刘继发和东风派的市革委副主任孙亦武等两派主要工人头头开始密切来往。其时赵紫阳提出成立“刘、孙办公室”，出发点是防止两派产生矛盾。但两派代表则想利用这个平台，共同向省市委提出落实新干部政策，要求“补台”，给“群众代表”安排实际职务。

5月上旬，省市委主要领导围绕“补台”问题分别找群众代表个别谈话或召开座谈会。

6月中旬，省委在越秀宾馆举办青年干部（属“草头王”的省市革委“群众代表”）学习班，班主任林若（后当广东省委书记第一把手多年），为期四十多天。

8月，省委组织部做出人事安排：梁锦棠入省总工会主持工作，刘继发调入省化肥办任副主任，刘均益入市团委主持工作，孙亦武分管市总工会，梁秀珍入省团委主持工作，武传斌调到惠州东江化肥厂当革委会副主任，不久，长期分居两地的妻子也由省委一纸调令调到惠州。

9月，高翔被安排到广东省军工局（对外称第二机械工业局）任副局长和党的核心组成员。

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后搞整顿。群众代表被要求下基层挂职蹲点。

2月，高翔作为省委工作组副组长，到红工煤矿开展整顿工作的，年底被安排到农村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

10月，中共广东省委发文，工农群众代表十二人也分别下放到县、公社挂职蹲点，其中：梁锦棠任中共三水县委副书记，刘继发任中共四会县委副书记，刘均益任中共增城县常委，梁秀珍任中共白云区副书记，莫超海任中共花县炭步公社党委副书记，张永立任中共从化县鳌头公社党委副书记，张伯辉任中共白云区××公社党委副书记，薛声钦任中共增城县朱村公社党委副书记。（市委曾在这之前，安排薛声钦几次参加市委工作组当副组长下基层“打临时工”。1972年5月参加解放南房管站房屋调查工作组，1974年3月参加广州轴承厂健全企业规章制度工作组，1975年2月参加广州钢铁厂企业整顿工作组，时间各约为半年。）……

这段期间，不少群众代表在地位改善以后，利用批林批孔清查林彪死党的机会，或写大字报，或找上级反映情况，或在各种座谈会上发言……呼吁要求为文革以来的大量冤假错案平反。例如曾列席市革委会的原广州中学红代会头头李庆蜀，被审查毒打后下放边远农村，就是薛声钦奔走得到两位市委书记批示，此时落实政策调回广州。

年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展后，群众代表政治地位有所提高，少数人进一步安排领导岗位，做实职工作。

1976年3月，中共广东省委通知，凡省市革委群众代表挂职蹲点下基层的人，全部回广州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4月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职务，仅保留党籍。

6月间，广东省委向群众代表有关人员发出任职通知，群众代表社会影响力明显提高，大约有15人被进一步安排领导岗位，做实职工作。具体如下：

梁锦棠任省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莫超海、丘学科任副主席（脱产）。刘继发任省化肥办主任（脱产）。孙亦武任市委常委，主管市总工会（脱产）。吴文彬任市总工会主席（脱产）。刘均益任市团委书记、党组书记（脱产）。梁秀珍任省团委书记、党组书记（脱产）。钟叙本任市委常委，主管市农业工作（脱产）。

高翔任省军工局（第二机械工业局）市委常委、局革委副主任。易作才调任省第一机

械工业局市委常委、局革委副主任。周焱调任省高教局市委常委、局革委副主任。薛声钦调任市机电工业局市委常委、局革委副主任。宴守云(铁路局东风派，市革委成立后一个星期补为市革委委员)调任市工交办任副处长。武传斌仍“挂职下放”东江化肥厂，在环境恶劣的第一线指挥生产。

第四阶段：“清查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1977年初，广东开始“揭批查运动”——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和清查其帮派体系。群众代表人人都要参加学习班，接受审查。有的人被批判斗争，正式关押。这场运动持续两年才结束。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77年1月，在广东省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省委号召全省人民“清查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3月，省市革委群众代表，原两派群众组织头面人物及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后安排到厅（局）以上当领导的人被作为重点，投入“牛棚”，有的“半托”或先“半托”后“全托”。

高翔从3月7日被隔离审查。

武传斌是5月被隔离审查。1976年9月毛去世时，他还上广东治丧委员会名单见报，几个月后就失去自由了。根据他的日记记录：5月15日“清查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工作队由惠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带队进厂。不久即开始写检查。5月下旬，惠州市委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批斗。6月11日在全厂大会上被宣布停职，全天办学习班，不久即被抄家。隔离审查时就关在住家附近42军的炮兵营里，由惠州市一名副市长负责看管。

5月中旬，省委在中山纪念堂两次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分别对红旗派工人头头刘继发、东风派工人头头孙亦武揭发批判大会，当时的《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都有报导。

薛声钦1月下旬还作为市工交代表团副团长出席省工业学大庆先进代表大会，住五星

级宾馆豪华套间，3月初就被隔离审查，随后被广州市机电局党委两次组织系统群众600多人在局礼堂进行批判斗争。关入牛棚期间，为了逼供“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交代“篡党夺权阴谋”（包括74年关于群众代表“补台”的议论）连续车轮式逼供审讯，最长一次达三天三夜。还被反复抄家。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结束全国性的政治运动，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1979年初，全国“揭批查群众运动”基本结束。

3月中旬，被隔离审查的工人代表都结束了“牛棚”生活，可以回家了。其中一些人被宣布解脱后还要继续接受工厂工人劳动监督改造。薛声钦在“全托”22个半月后，释放重新安排，在广州工具厂车间班组劳动改造期间，看病都被跟踪调查。1981年初转去广州高压电器厂做技术工作，劳动监督改造4年，政治审查持续到1983年。学生代表高翔是1979年3月16日释放的。武传斌则是一年多以后，1980年6月9日才被释放（7月7日补发释放证）。他在前述1977年6月被隔离审查一年后，又于78年7月13日，被地区和惠州市两级公安局局长带队，出示拘留证，戴上手铐秘密押送广州市公安局黄华路第一看守所正式单独关禁整整两年。释放前，省公安厅一位处长宣布，由于他在文革中犯了“打、砸、抢罪”，所以拘留审查。由于他态度好，问题又查清了，所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当即释放。武传斌后来回忆说，自己断断续续前后被关了7年，其中只有毛死后的这两年是真正坐正式的监狱，当时面临要判刑，被母校中大副书记以“小将犯错误”，没有刑事罪为由保下来了。武传斌还说，因为他都不判刑，广东的头头也就没一个判刑。而这段时间全国各地造反派头头被判刑的不少。¹武传斌释放回到惠州原单位后，1981年8月至1983年4月，由原来的副厂长被安排为基建技术员，助理工程师。1983年4月以后任厂承包办公室主任兼生产调度。

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修改宪法的决议各级革委会改为各级人民政府，从此省、市群众代表身份和头衔自动消失，因而退出政治舞台（武传斌在1982年才接到省

¹ 阿陀访谈武传斌记录。

委通知，被正式免去省革委会常委职务）。但是大部份代表原来在基层的行政职务还是暂时保留了。揭批查运动中对这些代表的审查，最后也没明确结论。

第五阶段：清查“三种人”

1979年释放被关押审查原群众组织主要头头和三结合的群众代表时，各单位专案组负责人交代，根据省、市委指示，被清查的人到工厂或农村劳动监督改造，是边劳动边补充交代问题，即审查并没有结束，到了1983年开始的“清查三种人”时，所有人又被再次审查，许多人被定性为“三种人”，是党员的被退党，是工人的撤销职务退回基层，对大学生则控制使用。

1982年7月3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必须对“三种人”保持警惕，决不能提拔造反派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对这些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必须坚决撤下来。”

同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1983年11月16日，中央公开《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指出“最危险的是文革三种人”

1985年5、6月间，广东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为部分群众代表做审查结论，一般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或犯“政治错误”，处理上“开除党籍，”或“自动退党。”并附上中共省委文件：免去×××党内职务、革委职务。据武传斌回忆：

广东文革听说由中组部文件下来划定的“三种人”一共五个：刘继发（红旗派、省革委副主任），刘均益（工交红旗派、省革委常委、省团委书记、中共中央委员），孙亦武（东风派、市革委副主任），高翔（华工红旗、省革委常委），武传斌（中大红旗、省革委常委）。

其中红旗派三人，东风派一人，工交红旗一人。其中职务最高的是刘继发，但他不是中央委员。工交红旗刘均益是中央委员。梁锦棠也是中央委员，但中央划“三种人”没包括他，原因不详。除了中央一级，省、市和地方各级也有权划定相应的“三种人”，好比中大红旗陈家吉，是中革委会副主任，厅级，就是由省里定为“三种人”。旗派新一司林昌文没有划为“三种人”，因为他那时已分配工作在湖南了，划不划由当地单位说了算。东风派易作才也不是“三种人”，一是因为他的影响达不到这一级，二是省军区力保。¹

五人中的三位工人代表，不但被退回基层当工人，而且必须调动单位。7、8月间，广州市工交政治部发文，通知有关工人代表接受新的工作安排。孙亦武不同意从广州氮肥厂调到广钢焦化车间当工人，离职后贫病交困，已病逝。刘继发从广重厂调到广州动力机厂当工人后，贫病交困，常饮闷酒，已于1994年9月病逝。刘均益从轧延厂来到市柴油机厂当工人，医生妻子即带女出走并与他离婚，后刘又患上脑瘤，贫病交困，已病逝。

学生代表高翔和武传斌仍然从事和专业有关的领导工作，但被控制使用。当时根据中央1983年4月23日向全国颁发《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精神，他们不能担任正职，也不允许出国。武传斌在东江化肥厂主持工作和后来创建啤酒厂都只能以副职挂名。他在2002年才以探亲的名义出国，定居加拿大，2014年病逝。高翔原来在军工系统被信任提拔，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因为揭批查运动被关押两年，放出来后，根据中央整党的决定和中发【1984】17号文件精神，被定为“打砸抢分子”和“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整党中不予党员登记。尽管所在单位党组织力保，向上级提出留党察看的处分意见，最后在1986年仍被否定驳回，理由是根据中央文件精神，“三种人”不能保留党籍。

其他部分群众代表去向如下：

中央委员、省革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梁锦棠没被划为“三种人”，实

¹ 阿陀访谈武传斌记录。

际按“三种人”处理。省总工会支部大会上被公开宣布开除党籍（但他个人表示不同意），所任领导职务同样全部撤销，同时也是属于前述市工交政治部文件通知被退回当工人的对象之一，从广州电机厂调到第一轧钢厂当工人。梁拒绝这安排，离职后自己开了电梯安装小公司养家糊口，现已退休。

省革委常委丘学科没被划为“三种人”，保留党籍，但所任领导职务全部撤销，后离职自行承包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部分小量包工工程，生活改善，已病逝。

省革委委员周焱没被划为“三种人”后来到省高等出版社任社长直到退休，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两位老干部省革委副主任王首道和陈郁出具书面证明，说当时安排他以干部代表身份参加省革委班子是周恩来授意的。

市革委副主任，农民代表钟叙本在所有群众代表中身份比较特殊，他是1958年4月毛泽东亲临广东视察棠下农村时接待组重要成员，受过毛泽东表扬。他在市革委会副主任位置上一直是“不倒翁”，1973年已经当上市委常委，脱产领薪上班，协助两任市长分管农业工作，也算有职有权。另一方面，从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到后来的“批林批孔”、“批判大会”、“反击右倾翻案风”，他都属于政治红人。但是1980年随着新一届“市人民政府”取代了原来文革产物的“市革委会”后，当了13年革委会副主任的钟叙本也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虽然不是“三种人”，一样回到棠下村当一普通农民。¹

市革委常委薛声钦，从没有人通知他是“三种人”，但由机电局组织部招去宣读了省委两个文件：鉴于在文革中犯有政治错误，作自动退党处理，同时免去局党常委，局革委会副主任职务，调入广重做技术工作。人事科长宣读完文件后补充说，技术工作仍属国家干部，即保持原来干部身份不变。薛声钦5年后离职，自谋挂靠广州市食品工业开发中心，2000年8月按国家劳保条例满60岁退休。

市革委委员林细钊自办海珠区民政工业财务公司，现已定居澳洲。

¹ 资料来源：《钟叙本口述历史：我任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经过》天河区地方志办公室蔡维朗、中共天河区委党史研究室覃卉 <http://www.gzsdfz.org.cn/>

市革委委员陈锡龙自己开办假肢制造服务公司，已逝世。

其他已逝代表有：林昌文、易作才、欧阳武、杨庆祥、陈振球、罗泽权、简少泉、卢良雅、张树雄、吴文彬、张永立。

综合来看，和以往历次政治运动后明确戴帽做结论不同，“三种人”既是一顶帽子，又不像一顶帽子，戴上去可能没有明显的标识，没戴上去不等于不戴。

陈云讲话表明，划“三种人”主要是作为干部使用提拔的一个标准。

广东在组织处理时有以下几个特点：

1、重点处理已经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的原群众组织代表，撤职或控制使用。党员要退党。

2、属不属“三种人”，不以职务、派别划线。因人而异，由各级党委内定掌握。划为“三种人”的，书面结论不一定都有“三种人”三个字，可能只是犯“政治错误”。

3、“三种人”里面，对仍保留一定职位的大学生干部，在提拔和出国等方面管控较严，对一般人则组织处理完就不再追究。

4、两派基本一视同仁。原属保守派和中间派的群众代表即使在文革期间没受到过任何政治运动冲击，但在毛去世之后的“揭批查”和“清理三种人”中，也和造反派一样下场。

5、一些没明确划为“三种人”的工农代表，同样被退党，被撤职，有的清退回基层还得调动单位，实际处理已经和“三种人”无异。■

2015年10月一稿

2016年1月二稿

【专稿】

从学术争议到政治批判

——从山东对《海瑞罢官》的讨论看文革的发动

张业赏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持续十年之久的运动之所以被称为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场运动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1965年11月开始的对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是如何成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索的，文革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动起来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对待文革的态度以及所采取的对策是怎样的，从对《海瑞罢官》的讨论、批判的进程中可以看出端倪。山东省对《海瑞罢官》的讨论和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是如何一步步被拖进文革运动的。

一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剧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等历史问题与现实政治斗争中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到一起，认为“退田”、“平冤狱”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的看法与论调，与文革之前历次文化领域的批判相比，是毫无新意的。但此文发表的背景是其成为文革导火索的关键。

姚文元文章的写作和发表得到了毛泽东的秘密支持，对这一背景许多中央高层负责人并不清楚，省级党委负责人更是无从知晓。中共山东省委及其主要负责人对这场批判的看法、态度，可以说是既没有感到出乎意外，也没有给予过多的重视和关注，更不会想到由此引起的后果及带来的灾难。这与当时的形势和这场批判运动发起的特点密切相关。综合

起来考察，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类似于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由来已久。1951 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政治权力干预文化和学术研究的典型事例，也开启了用政治批判对待、代替文化领域和学术研究中不同观点之间争论的先例。从此之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政治批判从未间断，并从 1964 年夏季开始，由文学艺术方面扩展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省级领导人已经从历次批判运动中摸索出了一整套应对的办法。第二，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势的估计，地方领导人远没有像毛泽东那样看得严重，许多人在内心也反感政治与学术混同一起的做法，不赞同毛泽东的意见。第三，省级领导人对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态度，也与自身的认识和当时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此时，省级主要领导人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经济的恢复发展上，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未投入多大精力。即使是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地方领导人对此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如 1960 年之前曾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舒同（后调任陕西省委副书记，主管文教工作）谈到当时的情况时说：“去年（指 1966 年）3 月 17 以前，我两次进北京 301 医院治耳病，对于当时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不曾引起注意（动手术后没有好好地看报纸），使《陕西日报》远远落在形势后面，很少批判文章。”那时，在中央层面上，阶级斗争被认为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地方领导人虽未对此提出异议，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完全接受这一观点。如云南省委曾出台云南“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省委文件。山东省委主要领导人则提出山东的主要矛盾是粮食问题，并组织全省大讨论。在批判《海瑞罢官》之初，山东更是在全力解决粮食问题，进行抗旱救灾。这从当时中央的部署以及山东党、政主要负责人谭启龙、白如冰的言论和活动中可以看出来。谭启龙更是提出了山东的主要矛盾“是粮食问题、吃饭问题”。他认为：“矛盾！矛盾！什么矛盾！山东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粮食问题，吃饭问题”，“为什么一口人二亩地弄不到饭吃？”并在 1965 年 5 月上旬到 8 月底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为时 4 个月的山东主要矛盾的大讨论。在讨论过程中，省委中心组成员有的说是“水利问题”，“肥料问题”，甚至说是“生产和生产不出来的”矛盾，“人和老天爷的矛盾”等等。总之，对山东主要

矛盾是什么的认识和讨论，是紧紧围绕生产力这一主题来进行的，并不涉及阶级斗争。毛泽东对地方负责人批判《海瑞罢官》的态度也有所察觉并表示不满。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两天后的11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到上海，途径济南、徐州、蚌埠、南京。沿途党政军负责人的汇报，主要还是集中在农业生产和粮食、备战和三线建设、领导方法、教育制度这些问题上，都没有提到当时毛泽东关注的“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更没有提到对《海瑞罢官》的批判。

中共中央华东局负责人对《海瑞罢官》批判的背景略知一二，所以，就全国范围来说，华东六省党报是最早转载姚文元文章的，但也没有给予多少关注。山东省的《大众日报》11月24日转载之后，近一个月毫无声息。之后，各省基本上严格按照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时发表的编者按确定的力度，把对《海瑞罢官》的讨论控制在学术批判范围内。12月3日，华东局宣传部电话指示山东省委，对有关《海瑞罢官》讨论提出了三个要点：（一）用什么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二）“清官”论问题；（三）道德继承问题，并再三强调要让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要使“讨论正常化”。12月5日，山东省委宣传部指示山东省历史研究所在省科技馆召开会议，传达华东局按《人民日报》的调子制定的关于《海瑞罢官》学术讨论计划。12月10日，山东省委宣传部召集文史界和高校的负责人开会，传达省委宣传部长王众音的指示：“范围限于对《海瑞罢官》文章本身的批判，不要联系本省的”，“坚持说理，以理服人”，“不要用质问口号”。丁秀生说：“不要搞工农兵批判”，“不搞人海战术”。1965年12月3日《大众日报》第三版同时刊载了《人民日报》11月30日编者按与11月29日《文汇报》编者按的内容。

根据华东局宣传部的部署，1965年底山东对《海瑞罢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文科各系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学院文科各系师生围绕《海瑞罢官》，就有关的学术问题展开讨论。

山东大学文史各系师生举行讨论会，围绕吴晗新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海瑞的历史地位、历史剧创作以及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讨论内容有以下

四点：

第一，《海瑞罢官》主要宣传了什么？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这出戏主要反映了农民要“退田”的斗争，剧作者这样写，是影射1961年“单干风”。另一种意见认为戏剧冲突是由恶霸徐瑛抢劫民女而引起展开的，处死徐瑛是戏剧的高潮，因“除霸”遭到徐阶和众乡官的反对，海瑞才罢官而去，因此这出戏主要是写“除霸”。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出戏通过“除霸”和“退田”等事件，描写了清官海瑞的形象，希冀人们向他学习刚直不阿、言行一致、艰苦朴素的高尚品德。

第二，怎样看待“清官”的问题。有的认为，对“清官”要一分为二，既要看到在本质上他们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又要看到他们在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肯定“清官”在历史上采取过一些客观上有利于农民的措施，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清官”虽然忠君，但在主观上也是“爱民”的。历史上无论什么官，都是统治压迫人民的，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清官”起了好的作用，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因此，应给“清官”一定的历史地位。另一种意见认为，“清官”和“贪官”都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表者，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贪官”是杀鸡取蛋，“清官”是“养鸡取蛋”，其目的都是“取蛋”。还有一些人认为“清官”披着为人民办事的外衣，对人民进行欺骗，模糊了阶级矛盾，延长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对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起了阻碍作用，因此，“清官”比“贪官”更坏，更阴险，应该全盘否定。第三种意见认为，真正的“清官”是不存在的。“清官”这个概念是虚构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麻痹人民斗志的一种手段，所谓“清官”是封建法律的维护者，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卫护者，是不可能有为民除害的清官存在的。

第三，如何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有人认为历史剧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可以有所增删，允许艺术加工的，但不能歪曲历史人物的阶级本质。吴晗把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大官僚描写成为贫民利益而斗争的英雄人物，成了农民的救星，这是歪曲历史，美化古人。有人则认为在《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基本上是符合史实的。《海瑞罢官》是继承了

过去清官戏的传统，而吴晗不过是把历史上的海瑞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罢了。

在讨论历史剧的古为今用问题时，有人认为，在大演现代戏的同时，不能不要历史剧，但要去糟取精，一切从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原则出发。有人认为吴晗的新编历史剧不是古为今用，而是古为今害，是借古攻今，借古讽今或借古非今，借古人来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有人认为，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以英雄史观为指导，以统治阶级为主体，以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为线索，撇开了马列主义阶级分析法，采用抽象论证、客观主义的小批大捧的方法，宣传了阶级调和论。

第四，《海瑞罢官》是否宣扬了阶级调和问题？有的人认为农民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是否可以调和，那要看怎么理解。如果认为“调和”就是没有矛盾，当然不对；如果理解为统一则是可以的。如封建社会发展了，主要是地主得到了好处，但农民也不是一点好处也捞不到，否则就会得出历史倒退的结论。

山东师范学院文科各系师生的讨论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清官”这个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历史上有“清官”。但是“清”与“不清”在不同社会有不同的内容。历史上的“清官”决不是脱离了封建剥削阶级本质的“清官”。无论是“清官”还是贪官都不能超越他们的阶级界限。另一种意见认为历史上根本没有“清官”。其理由有二：一是人民所说的“清官”是农民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奴役地位，希求解放而幻想出来的；一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麻痹、欺骗人民而制造出来的。海瑞的出现就是统治阶级的需要和农民思想认识不足而产生的。我们应该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来揭露他、批判他，让人民群众从落后的传统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第二，关于怎样评价历史人物以及海瑞该不该肯定的问题？总的争论各方不同意吴晗对海瑞的美化和歌颂。但在具体分析时，有以下几种不同意见。有的认为，肯定或否定一个历史人物，要看其站在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哪个方面来决定，就是说，看哪个阶级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这个人是在哪个阶级立场上，代表哪个阶级利益的。封建社会的“清官”、好官都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因此都应否定。海瑞纯粹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个走

卒，他的“退田”是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万世基业”着想，他的“以工代赈”、兴修水利，也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制度的。这样就延缓了革命的爆发，阻滞了社会的前进，因此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从这方面看，“清官”比“贪官”更反动。有的认为在某个朝代开始时，封建统治阶级慑于前朝的动乱和崩溃，被迫采取了一些“与民休息”的让步政策，对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一定的作用，因此可以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但当某一朝代末期，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农民揭竿而起，冲击封建王朝的时候，再实行改良主义措施，就失掉了任何进步意义而转成反动。海瑞恰恰处在明末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封建统治摇摇欲坠的时期，他的改良主张，只能是麻痹人民的鸦片，决不能给予肯定，更不能像吴晗那样加以美化和颂扬。不同意上述意见的认为，对海瑞应当适当肯定。评价历史人物需要两个肯定、两个否定。如海瑞从统治阶级内部比较来说，应是被肯定的人物；但对人民来说就应是被否定人物。否则，唐太宗和刘黑达处在同一时代，而且是同时被肯定的人物，应如何理解？秦始皇和陈胜、吴广也是处于同一时期，又都是被肯定的人物，如何理解？海瑞退田、除霸、兴修水利，对当时的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有一定好处，确实有利于人民，因此，不应全盘否定，而应当适当肯定。至于海瑞的主张是否能推行下去，影响多大，那是另外一回事。还有的说，在历史上，不能否认某些统治者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清官、好官不能完全否定，而应当具体分析。好官总比坏官好，因为坏官破坏了统治阶级的正常秩序，阻碍了社会发展。

第三，《海瑞罢官》宣扬了些什么？应怎样认识《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有人认为《海瑞罢官》这出戏抹煞了阶级矛盾，掩盖了朝廷和“王法”的本质，丑化了农民革命形象，美化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宣扬了阶级调和论，是一出地地道道充满封建毒素的坏戏。吴晗在这出戏中，虚构了一个“好官”搭救“顺民”的故事，把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仆——海瑞，颂扬成一个“当时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把劳动人民歪曲为只会“喊冤”、“叩头”、呼唤“青天大老爷”的“懦夫”和“顺民”，企图证明对立阶级是可以调和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可以相互合作、相依为命的，劳动人民

只有等待统治阶级中出现清官、好人，才能获得解放，并在他的“卵翼”之下才有“好光景”。这纯粹是阶级调和论和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另外有的认为不能把《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和“平冤狱”与现实的“单干风”和“翻案风”联系起来。认为这样联系有点牵强附会，没有说服力。有的说，资产阶级进攻，反对的是社会主义，而海瑞反对的是贪官污吏，怎么能相类比呢？有的说：分析作品的现实意义不能简单化。你为什么单去领会这是影射人民公社和“平反”呢？你不好去领会这是影射反对坏人坏事吗？这样不也有教育意义吗？

曲阜师范学院文科师生就《海瑞罢官》和有关问题，展开了多次座谈讨论。

在讨论《海瑞罢官》到底宣扬了什么时，绝大部分师生认为《海瑞罢官》歪曲了历史，虚构了一个“青天大老爷”，要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去学习，其目的在于借古讽今，剧中的“退田”和“平冤狱”是为配合1961年的单干风而写的，是阶级斗争在思想领域内的反映。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单从阶级观点出发，也得考虑历史条件”；清官、贪官不能“一锅煮”，清官对人民的态度好，当时所起的作用也好，应适当肯定。在吴晗的原著里，“退田”是题材，通过“退田”说明“除霸”的主题，不能说作者写“退田”就是教育人们学“退田”，这样说就歪曲了原著的意思，作者的主观愿望不一定是这样的。不应该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

在讨论“清官”和“贪官”的区别及其历史作用时，有四种不同的看法：（一）历史上的“清官”和“贪官”是一路货色，凡是“官”，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其阶级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封建统治政策的产物。（二）“清官”和“贪官”本质上一样，但也有区别。把“清官”和“贪官”“一锅煮”不行，应区别对待，我们对地主阶级分大中小，对资产阶级分左中右，这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思想。（三）“清官”比“贪官”好。“清官”不能同“贪官”并列，更不能说比“贪官”坏，旧社会有合法剥削同习惯的特权，“清官”维护了法定的剥削权力，而反对习惯的特权，在一定情况下，对社会可以起到休养生息的作用，在客观上有利于人民，对社会发展有所推进。（四）“清官”比“贪官”更坏。有

人说：“毛主席曾说‘肯尼迪政府只能比艾森豪威尔更坏些，而不是更好些。’同样的，明朝末期的清官海瑞只能比严嵩更坏些，而不是更好些”。另外有人认为，历史上根本不存在“清官”，“清官”是统治阶级为了欺骗人民吹捧出来的，或者是劳动人民理想的化身。

关于海瑞在历史上的作用，也有热烈的争论。绝大部分人肯定海瑞是个改良派，但具体见解不同：（一）改良派比反动派更坏。历史上每当产生改良主义的时候，正是革命斗争尖锐的时候，改良主义者都是维护反动统治的，所以海瑞并不好，而是更坏。（二）改良派比反动派好。历史上海瑞的改良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客观上对农民的利益有维护作用。（三）改良派的好和坏要作具体分析。当革命向前发展的时候，改良主义是反动的（如王莽变法）；当农民革命为地主阶级创造了改良的条件，地主阶级进行了改良，这是有进步意义的（如唐太宗的减徭代役）。

对写历史剧的问题，多数人认为可以写，也允许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但艺术加工不能超越阶级界限，不能改变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不能把坏人夸张为好人，也不能与此相反。吴晗正是把压迫人民的统治者夸张成了为人民谋福利的人物。但另一种意见强调没有虚构就没有艺术。海瑞在历史上确实平过冤狱，也处理过徐瑛，可以对海瑞进行艺术加工。因此吴晗完全可以反驳姚文元说，我写的是历史剧而不是历史。

在如何研究历史的问题上，有人认为研究历史既要有阶级观点，也要有历史主义的观点。研究历史应该站在社会发展的历史上看问题，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由社会发展而来的。当前地主阶级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但它刚刚在历史上出现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呢？也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过高地估计统治阶级，也不会不在历史上给他们以一定的地位。

1965年12月21日第三版《大众日报》，刊载了署名曲文的文章《揭穿海瑞罢官的实质》。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也代表山东主要领导人对此问题的认识。文章开头即讲：“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吴晗同志通过剧中海瑞的形象美化地主阶级，宣扬阶级调和，借古讽今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批判。

接着该报连续发表了一些信稿和文章，对姚文提出许多质疑。说明在如何评价剧中的海瑞形象，《海瑞罢官》是否正确的反映了历史，如何认识《海瑞罢官》的思想倾向等问题，都存在许多分歧。”文章主要观点有：海瑞的形象不但美化了地主阶级，而且歪曲了当时的阶级关系；对贪官和清官应当有所区别，但区别必须在阶级分析的原则下进行，决不能成为掩盖其阶级本质的借口；吴晗的严重错误之一，正在于他评价和描写人物时完全离开了阶级分析的原则。因此，他就不能不歪曲人物的阶级面貌；丑化劳动人民；宣传阶级调和论，宣扬改良主义；有的同志反对将历史剧和现实扯到一起。我们认为这要看怎么个扯法。谁都知道，世界上并不存在着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历史剧当然也不例外。作者选择什么历史人物，从什么角度强调，给予怎样的评价都是有用意的。不管作者是否自觉，他创作的动机和注入到历史人物的思想感情，都和现实特别是和阶级斗争形势相关联。因此，决不能离开时代抽象地讨论作品的思想倾向。同日，《大众日报》第三版详细报道了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学院文史各系师生开展的讨论情况，并发表了与《人民日报》编者按意思相近的编者按，其中许多语言是直接引自《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自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引起了各方面读者的注意。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学院的文科师生，本着百家争鸣，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精神，相继展开了热烈讨论。现在我们报道上述三校文科各系的讨论情况。从他们讨论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对《海瑞罢官》和有关问题的评价，实际上涉及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以及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对于《海瑞罢官》和有关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揭露矛盾，辨明是非，弄清问题，解决矛盾，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为此，我们准备就这个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场辩论。我们希望在辩论中，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这就是：在辩论中，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也要采取说理的办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

各项工作的好方法。’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发展真理。我们热烈欢迎史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遵循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经常教导和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精神，踊跃参加。”

二

在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大学文科各系师生热烈讨论《海瑞罢官》的同时，山东社科界也积极组织对《海瑞罢官》的讨论。1966年1月底，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联合邀集省文、史、哲各界专家、学者，就《海瑞罢官》讨论所引起的有关“清官”、历史人物评价以及道德继承等问题，举行了学术讨论会。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学院的文科教师以及有关理论工作者共70余人。会议历时5天，主要讨论三个问题：一是用什么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以及对历史上统治阶级的人物应当如何评价的问题；二是“清官”与海瑞评价问题；三是封建道德有没有全民性，无产阶级能不能继承封建道德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吴晗提出的要按当时当地的标准评价历史人物的看法是十分错误的。从实质上看，那种当时当地的标准，是要我们放弃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要我们随着封建文人的腔调赞美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孝子，为他们的代表人物歌功颂德，也就是企图用封建地主阶级的观点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正确的标准。对于统治阶级的历史人物，首先必须划清阶级界限，揭露他们的阶级本质，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结论。”“但也有人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光用阶级观点是不够的，而应当有两个标准：一、根据历史的标准给以肯定或否定，但肯定不等于赞扬；二、根据现代的标准给以批判或歌颂，但批判不等于否定。以这样的标准去评价统治阶级人物的历史地位时，只能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给以肯定或否定；否则，用今天无产阶级的标准来衡量，就没有一个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了。

劳动人民推动历史的作用，在一定时期只能通过统治阶级个别人物作为桥梁来实现，劳动人民好像是动力机，统治阶级个别人物好象是工作机，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推动历史前进。所以，肯定统治阶级历史人物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肯定劳动人民的作用。”但许多学者不同意这种意见。“有些人批评这种观点说，评价历史人物只有运用阶级分析的标准，这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应当把历史人物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弄清当时的阶级分野和阶级斗争形势，分析这个人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阶级性，看他的活动是站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哪一方面，对历史发展起了什么作用，给以恰当的历史评价。如果某些历史人物在今天条件下还有影响，那还要分清这些影响的来龙去脉，指出其在今天所起的作用。我们应当肯定他有利于历史发展，有利于人民斗争的一面，否定他不利于历史发展、有害于人民斗争的一面。评价统治阶级历史人物同样也是如此。但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只能是劳动人民，认为必须通过统治阶级才能起作用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还有的人认为，我们应当站在历史上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一边，带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来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因此，对于历史上各个剥削阶级的人物都应当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进行具体分析，划清阶级界限，凡是同情劳动人民和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应当加以肯定，其中抵抗外国侵略的民族英雄，还可以适当的颂扬。”“还有一种意见则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当以是否推动历史发展为标准，只有劳动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剥削阶级不可能对历史起促进的作用。因此剥削阶级的历史人物都应一概否定。至于剥削阶级内部不同人物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促退作用大小的差别而已。”

关于“清官”与海瑞评价问题。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吴晗在《海瑞罢官》中所塑造的那种为民做主、为民谋福利的海瑞式的“清官”历史上是没有的，剧本中的艺术形象海瑞是吴晗假造出来的，是有意模糊阶级界线，宣扬阶级调和，借古讽今，反对社会主义。在讨论中，绝大多数人还认为，不管“清官”还是贪官，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工具，其阶级本质是完全相同的。但对于“清官”所起的历史作用也应适当予以肯定。

关于第三个问题封建道德有没有全民性，无产阶级能不能继承封建道德？在会上发言

的许多人都表示不同意吴晗关于封建道德具有全民性,无产阶级可以继承封建道德的观点。

“许多同志指出,封建道德只是一种为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道德规范,是地主阶级欺骗农民、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事实上,连地主阶级本身,也往往并不遵守封建道德。从封建道德中的忠、孝、节、义等内容来分析,也完全是一种糟粕,根本没有什么精华可言,他和我们今天的共产主义道德的内容,更毫无共同之处。从辛亥革命以来几次重大的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事实来看,封建道德在每次反革命复辟或反革命政变中,总是成为反动派手中的一个重要武器;在当前阶级斗争中,也往往成为阶级敌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武器。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认为封建道德具有全民性,可以为我们继承的观点,都只能是取消阶级分析,宣扬合二为一的阶级调和论。我们不仅不能继承封建道德,而且只有把它彻底批判、否定、打倒,清除掉它的影响,才能建立起无产阶级自己的道德观。”“有的同志还提出了怎样看待岳飞的爱国主义的问题。发言者都不同意那种认为地主阶级爱国主义思想可以批判继承的观点。但是对于岳飞爱国主义内容的分析,还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岳飞是地主阶级的功臣,他的爱国主义完全是地主阶级的道德,是与忠君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完全不能继承。另一种意见认为,岳飞爱国主义有不同的阶级内容,他的忠君思想是糟粕,是受地主阶级爱国主义思想支配的表现,是应当否定的;但他的民族气节,用武力抗击外来侵略,这是劳动人民的品德,是他在阶级斗争中接受劳动人民思想影响的结果,是应当肯定的。这两种对立的道德,在岳飞身上正是一种互相斗争的关系,而不是互相调和的关系,因此,这样的看法不同于认为岳飞爱国主义具有全民性的观点。”

1966年2月22日,《大众日报》发表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冯沅君《从清官戏的本质看〈海瑞罢官〉》。该文认为“《海瑞罢官》这个剧所涉及的问题是究竟如何看待“清官”戏的问题、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以及古为今用、批判继承等等。”文章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先论封建清官戏的本质;次论1960年前后,所谓戏剧逆流中的清官戏是与社会主义唱反调。第二部分,论《海瑞罢官》与前代、当代一些清官戏的关联。第三部分,从

吴晗的所谓错误的历史观、道德观、文学观来看，说明他是一个阶级调和论者，而《海瑞罢官》正宣扬这种反动思想。第四部分，驳斥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文章指出：从历史观、道德观、文学观三个方面论述说，吴晗是个阶级调和论者，“《海瑞罢官》主要而严重的错误在于此。”“阶级调和论背后隐藏的丑恶思想是反对阶级斗争，是反对革命。”

从这一阶段对《海瑞罢官》的讨论情况及其反映出的参与讨论者的态度和观点来看，山东基本上是按照中共华东局的指示和中央确定的《人民日报》编者按的精神开展对《海瑞罢官》的讨论、批判的，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山东省委及其主要负责人对待这场文化批判的态度。尽管当时《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说吴晗的历史剧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但对地方上进行的讨论并没有多少影响，这与1966年5月之后，地方的批判完全紧跟《解放军报》的口径不同。讨论中虽然充满了以往历次学术批判中早已存在的把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把学术讨论与政治批判混在一起的现象。这说明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为特征的“左”的思想，在指导思想已开始占居主导地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已成为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遵循的原则。但在知识界、学术界仍存在着极为可贵的、颇有价值的、与当时的所谓主流思潮不同的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观点和思想。如在曲阜师范学院的讨论中，有的人就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单从阶级观点出发，也得考虑历史条件”；清官、贪官不能“一锅煮”，清官对人民的态度好，当时所起的作用也好，应适当肯定。在吴晗的原著里，“退田”是题材，通过“退田”说明“除霸”的主题，不能说作者写“退田”就是教育人民学“退田”，这样说就歪曲了原著的意思，作者的主观愿望不一定是这样的。不应该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在如何研究历史的问题上，有人认为研究历史既要有阶级观点，也要有历史主义的观点。研究历史应该站在社会发展的历史上看问题，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由社会发展而来的。当前地主阶级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但它刚刚在历史上出现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呢？也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过高的估计统治阶级，也不会不在历史上给他们以一定的地位。

山东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情况应当是全国各地这段时间总体情况的一个缩影。地方领导人的这种态度和做法带有普遍性，使毛泽东对地方领导人十分不满，从而成为毛泽东决定在1967年开展全面夺权斗争，整治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毛泽东于1966年四五月份提出每个省要搞一两个人之后，各地才不得不在自己管辖的地区和范围内，从地方上物色适合进行批判的人选，以应付中央和毛泽东，从而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进入一个新阶段。

三

1966年4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界出，党、政、军也有，各省、市、区都要批判一、二个人。这次会议基本通过了经毛泽东七次修改定稿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迫使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不得不加大批判力度，以适应形势需要。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解放军报》4月18日社论的发表标志着先前以文化界为主的对《海瑞罢官》的学术批判开始转为大规模的全国范围的、社会各界均参与的政治批判。从此，《解放军报》代替《人民日报》成为文化革命的风向标。外国观察家也敏锐捕捉到了这一变化。1966年7月1日，日本《现代之眼》第七卷第六号刊载竹内实《中国的文化革命意味着什么？》一文指出：“当前最重要的文章，是《解放军报》4月18日的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与彭真的讲话（指1964年7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的彭真关于京剧现代戏会演的讲话）相比较，这篇社论强调阶级斗争，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尤其其中明确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概念，旗帜非常鲜明。通过对比这两篇论文可以明白，如今解放军即林彪，已经变成了文化革命的领导力量。《解放军报》社论所强调的，还有号召分析与评价所有的文学作品，号召群众路线，号召打破所谓‘文艺评论家’垄断批评的局面。

彭真希望专家批评自己，而林彪则号召依靠群众来批判专家。这可以被视为，对著名文化人的批判和文化革命，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日，《光明日报》发表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批判的重点开始由吴晗转向邓拓和“三家村”，或明或暗地把斗争矛头指向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发动对《海瑞罢官》批判的真实目的逐渐显现出来。

为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和风向，山东省委在5月中上旬连续召开多次会议，讨论、部署“文化革命”的相关工作。山东对《海瑞罢官》讨论与批判也发生重大变化，由学术批判转向政治批判，继而向政治运动转变，对《海瑞罢官》和其作者吴晗发展成为涉及到更多人的更为激烈的声讨和批判。1966年5月16日，《大众日报》发表《彻底清除〈燕山夜话〉的反动流毒——评丁秀生的〈历下漫话〉》，标志着山东实现了从学术讨论向政治批判的转变，运动由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这一阶段，《大众日报》在转载一些政治批判文章的同时，发表本省理论工作者的政治批判文章。1966年4月13日的《大众日报》发表署名鲁理文的《驳“清官”论》的文章。文章开头就充满火药味，称：“‘清官’论，是吴晗同志用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的一枝毒箭。他通过美化封建统治阶级的所谓‘清官’，来宣传阶级调和；通过颂扬海瑞的‘罢官’，来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挽歌；通过宣扬‘平冤狱’和‘退田’，来鼓动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向社会主义制度进攻。”

以前仅限于高等院校文科师生、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参与文化批判的情况有所改变，运动的参与者由学术界、教育界和党政机关发展到社会各界。更多的单位、部门和工、农、兵、学、商等各个阶层的人士参与了政治批判。4月19日，《大众日报》刊登《农民驳吴晗——历城县祝甸公社辛甸大队贫下中农社员讨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纪要》。文章称：“历城县祝甸公社辛甸大队贫下中农同志，在批判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这两棵大毒草时，他们遵循着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教导，运用家史、村史、阶级斗争史的生动事实，驳斥了吴晗的‘清官论’、‘道德继承论’以及

‘让步政策’等反动观点，揭穿了吴晗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实质……这个事实再次证明：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国劳动人民，不仅在政治上翻了身，做了国家的主人；而且，在思想上、文化上得到了大解放。理论开始从课堂、研究室解放出来，少数知识分子垄断理论的局面被打破了，工农兵群众掌握理论的新的历史时代开始了。” 1966年4月24日，《大众日报》刊载《彻底粉碎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济南第一机床厂部分职工严正批判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4月26日，《大众日报》刊载《彻底粉碎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解放军某部指战员严正驳斥吴晗的反动政治观点》称：“最近，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某部指战员连续举行座谈会，愤怒地对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了批判。”其题目有：“宣扬‘清官’论的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吴晗，别装‘糊涂’”（该文说：吴晗“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撑腰，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路的”）、“道德继承论是为和平演变效劳”、“吴晗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决不容许吴晗污蔑我们伟大的党”等。

4月29日，《大众日报》刊载《彻底粉碎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曲阜师范学院师生严正批判吴晗的反动罪行》，其编者按论调的变化反映了批判性质的变化。编者按说：“近日来，曲阜师范学院文科师生，连续举行座谈会或纷纷给报纸写稿写信，严正驳斥吴晗同志借‘清官’论、‘道德继承’论以及所谓‘让步政策’等反动政治观点，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阴谋，愤怒地揭发了吴晗同志毒化青年的恶毒目的和狡猾手法，无情批判了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他们并表示，要坚决彻底肃清吴晗同志在青年当中散布的恶劣影响。”文章的题目有“揭露吴晗的反动面目，坚决同吴晗斗争到底”、“肃清吴晗放的毒”、“清算吴晗毒害青年的罪行”、“吴晗借尸还魂反党反人民”等等。

文化界、教育界的多数单位，将文化革命作为突出的政治任务，集中主要精力来抓这项工作。省直不少厅、局和各大专院校党委以及济南、青岛等地，都建立了文化革命办公室，协助党委、党组具体组织这场斗争。5月上旬，山东省委各部、委，省总工会，省共青团，省妇联，省教育厅等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组织，先后发出通知，号召广大干部、群

众积极投入运动。省委宣传部还下发通知，将干部学习内容作了调整，要求集中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四篇文章和《解放军报》社论和姚文元的文章，以促进运动的深入发展。各高等学校、中等学校的历史、中文、政治理论等课程，一律改为学习毛著和有关文化革命的文章。

政治批判在全社会开展起来。如青岛铸造机械厂的职工，四天的时间写出批判文章 300 多篇。山东大学截至 5 月 16 日，已写短文、评论等 8,000 余篇。济南有的中学生破指血书，表示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还有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提出，宁可不考大学，也要积极投入战斗。据山东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 1966 年 5 月 17 日《关于我省文化革命情况的第二次简报》记载：“干部、群众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学习了有关文化革命的社论、文章以后，觉悟迅速提高。原来积极的人更积极；原来不明真相，掉以轻心的人大吃一惊；原来置身事外，无动于衷，认为是‘学术之争’、‘文人相轻’、‘打笔墨官司’的人，如梦初醒。他们说：‘啊呀！再不把他们打倒，邓拓、吴晗这伙人就要使我们的国家变颜色了’，‘这关系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和世界革命的大事，再不能麻木不仁了’。特别是工农兵群众，对邓拓等人的反党罪行怒不可遏。连日来，工厂、农村、连队、机关、学校纷纷集会，写文章，出墙报、贴大字报，声讨邓拓、吴晗的反党罪行。”工农兵参加所谓学术批判不是什么划时代的大事，而是由学术批判转向政治批判的显著特征。

以前确定的文化批判不涉及本省具体人物的做法有所改变，开始了对本省有关人物的批判。这种转向是在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产生的，是应付中央的新做法。对于对本省人物批判的部署，山东省委作了周密准备，并对批判作了初步规划。对政治批判的时机选择、重点批判人物的确定、批判的先后顺序、采取的方式以及如何在全省各级选择批判人物都有考虑。其计划包括：（一）严格控制批判人数，在省级选择三至四人。在各单位进行摸底排队。要求“各单位都要组织力量，查作品、查言论，对过去几年特别是 1960 年至 1962 年的书籍、文章、讲稿、诗、歌、画等，进行具体排队，从中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派抓出来，抓住其中的重点人物和关键问题。特别要在党内先排队，

首先摸清领导状况，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在材料准备工作未搞好之前，一律不急于开展批判。”（二）在开展大批判的同时，有领导地进行调查研究，摸底排队，狠抓材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同时，山东省委组织力量，在重点文教单位和其它重点单位大众日报社、出版社、山东大学、济南机床二厂等调查摸底。济南市也选择了三个工厂一个中学，作为重点了解情况的单位。其方法基本是沿用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的做法。“省文联的文艺队伍32人，初步排出右派4人。山东大学初步排出右派代表8人。”

在山东，首先遭到重点批判的人物有山东省政协委员、副省长余修，山东省委党校副校长李景春，大众日报社文艺部主任丁秀生、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刘知侠等。重点批判的作品有《大众日报》的《历下漫话》专栏、柳子戏《孙安动本》等。省委对具体人物和作品批判的先后顺序进行精心安排，决定先公开批丁秀生和《历下漫话》，再批余修，最后批《孙安动本》。《历下漫话》及其作者丁秀生由于与邓拓等人物和《燕山夜话》的诸多联系，不可避免地成为山东省选择批判的首要目标之一。《历下漫话》是《大众日报》副刊《丰收》在1962年7月创办的一个专栏，形式类似于《燕山夜话》。丁秀生化名南天，从1962年7月22日到10月7日，共发表13篇杂文，其中1篇是讲历史的。不可否认，这一专栏的主题与现实密切相关，有总结1958年以来“大跃进”运动等“左”倾错误的意图。《历下漫话》的开辟，由于形式相同，内容相近，意图相似，引起了《燕山夜话》的注意。邓拓在《燕山夜话》第五集“奉告读者”中，专门介绍了《历下漫话》，说：“在《燕山夜话》出版之后，其它地方有些报纸，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也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发表知识性的专栏杂文。如山东《大众日报》在第三版右上方也开辟了这样的专栏，名为《历下漫话》；……我衷心祝愿这些报纸的专栏杂文，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并且不断地改进内容，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同时希望读者们能够从这些报纸的专栏杂文中得到有益的知识。”

1966年5月16日，《大众日报》发表署名高向东的《彻底清除〈燕山夜话〉的反动流毒——评丁秀生的〈历下漫话〉》一文，按照既定部署，开始公开批判《历下漫话》。《燕山夜话》和《历下漫话》被称作“一爿黑店，两块招牌。总店在北京，分号设济南。南北呼

应，一唱一和。《历下漫话》不仅在内容上极其反动，和《燕山夜话》完全是一个腔调，而且在形式和手法上也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打着谈历史、传知识、讲故事、说笑话的幌子，借古讽今，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旁敲侧击地对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一系列的恶毒攻击。事实十分清楚，《历下漫话》是‘三家村’黑店伸出来的一个反革命触角，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历下漫话》的出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一样，都是过渡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里激烈的阶级斗争反映。它是在国内外阶级敌人向我们的党和国家猖狂进攻的时候，为了适应被推翻的反动阶级的力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需要而服务的。”

“总之，《历下漫话》和《燕山夜话》一样，是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它的矛头完全是指向我们的党，指向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对《历下漫话》的批判和对《燕山夜话》的批判几乎如出一辙。《燕山夜话》被批判为：“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反对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吹捧他们的反党‘骨气’，鼓励他们东山再起”；“《燕山夜话》假介绍‘知识’之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历下漫话》则被批判为：“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总路线、大跃进，极力挑拨离间党和群众的关系”；“发泄对社会主义现实的不满，煽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民请命’‘舍身求法’，向党猖狂进攻”；“宣扬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攻击党对文艺的领导”。

5月23日，《大众日报》发表《丁秀生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一文，认为“丁秀生射出的毒箭之一，是恶毒污蔑和丑化我们的党和干部，通过美化封建公侯将相来赞扬和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丁秀生射出的毒箭之二，是诬蔑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三面红旗，美化旧社会，妄图使资本主义复辟”；“丁秀生射出的毒箭之三，是攻击党的文艺方针，同无产阶级争夺阵地”。在此期间，对《历下漫话》的批判与对邓拓、“三家村”的批判同时进行。报纸上连篇累牍发表工农兵的批判文章，在全省掀起了一个批判高潮。劳动模范、五好战士、先进工作者等纷纷发表所谓文章声讨，但批判内容基本一样。这从1966年5月19日《大众日报》报道的济南大批判情况可见全省的一斑。“邓拓黑帮的反

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被揭发以后，全市广大人民群众纷纷举行声讨会、座谈会，并通过黑板报、墙报、大字报、广播等各种宣传工具，向邓拓黑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济南成通纱厂和济南第一机床厂职工，几天的时间，就写出批判‘三家村’黑店的文章 1820 篇。”

此时对本省具体人物的批判虽已开始，但明显仓促。“有些地方，只限于表面上的轰轰烈烈，亟待深入一步；多数单位至今还底子不清，阵营不明，影响着运动的发展；还有个别单位，无人负责，贯彻不力；轻敌麻痹思想，与己无关、站在运动以外的思想等等，还没有认真解决。另一方面，有些单位在群众中已经出现某些急躁情绪，有些人急着要和某些人斗争，认为学习文件学不下去，问题没有摸准，就想上阵战斗。有的单位，分不清两类性质矛盾，在反映问题时，有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现象。”由于对本省具体人物和作品的批判并非出于山东省委及其主要负责人的本意，而是应付中央的策略，再加上受到批判的这些人物和作品与许多山东各级干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出现上述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这些做法是不得人心的。

按照既定部署，在公开批判丁秀生和《历下漫话》的同时，批判余修的文章也紧锣密鼓准备起来。到 5 月 16 日，正在撰写的文章已有十余篇，有的已写出初稿，正在反复修改。1966 年 5 月 27 日，《大众日报》第一版整版发表署名东生的《戳穿余修的反动面目》的文章，开始了对余修公开批判。文章批判说“余修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政府内的代理人 and 野心家”，“从余修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中，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出，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开设的‘三家村’黑店，是一个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在我们山东也有他们的分店。这个分店的掌柜就是余修”；“他到处开会、演讲，发表文章，在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中，积极进行他的工作，并且俨然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卫士自居，打着为他们请命的幌子，到处收买人心，积极组织他的反党队伍。好像只有他最懂得文教工作的特点，最懂得作家、学者的劳苦，最尊重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在第二版《揭开余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盖子》的说明写道：“1960

年到1962年，国内外阶级敌人利用我们的暂时困难，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向党和人民发起了猖狂进攻。在这一形势下，当时我省文教工作负责人余修，竟然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与国内外阶级敌人相呼应，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讲话，带头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积极推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进行了一连串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这些文章、讲话曾在党内外广泛流传，使党和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受到了很大损害。”余修的罪行是：“一、猖狂向党进攻，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二、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反对党的领导，积极推行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三、为复辟资本主义、封建主义鸣锣开道，死力反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

对余修的批判与对丁秀生的批判相比，又进了一步。批判版面均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批判丁秀生《历下漫话》是用第一版半版的篇幅。批判文章大多数是个人署名文章或对基层单位批判丁秀生情况的报道。对余修的批判则有所升级，省级机关、省直部门声讨余修的大会被连篇累牍地报道。

5月27日，山东省省直各部门、各市地等同时分别举行集会，声讨、批判余修等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在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全体人员集会上，省委各部委、各群众团体的干部以及食堂炊事人员、家属和机关民兵均作批判发言；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人事局、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人员集会声讨余修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省直农林水部门全体干部职工举行声讨大会；省商业厅机关和直属各单位1000余人集会声讨余修；省卫生厅机关及直属单位和济南市部分卫生工作者1100余人的集会更是一起振臂高喊：“彻底捣毁余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日，济南市也开始了规模大的批判运动。29日上午，济南市“五好”职工、“六好”职工、先进工作者、老工人积极分子和各界青年3500余人，分别在职工剧院和八一礼堂集会，愤怒声讨余修。青岛、淄博、枣庄等地也纷纷举行声讨大会、座谈会等。

对余修的批判大多是空洞的声讨，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最有分量的除第一天的批判文章外，6月2日《大众日报》发表的署名山东大学周通、鸿模、智棠、寅美、陈威的《剥

开余修的画皮 粉碎余修的反党阴谋》一文，对所谓余修蒙骗群众，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进攻的手法总结为三张“护身符”、两条“绳子”和一支“曲笔”，可谓有点新意。三张护身符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把自己装扮成一直是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故意掩盖文艺队伍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粉饰太平，借以抵制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幌子下，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条绳子是反对所谓“简单粗暴”和“强调文艺特殊性和艺术固有规律，用以反对文艺革命”。一支曲笔是蒲松龄写《聊斋志异》的笔法，即拐弯抹角的手法。因为余修在参观蒲松龄故居时曾提过“我爱先生曲曲笔，道尽人间真真情”的诗句。

从5月9日《大众日报》转载高炬《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何明《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到6月13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大众日报》编辑部收到揭发、批判、声讨所谓邓拓黑帮和余修、丁秀生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来稿来信40,000余件，对《海瑞罢官》的学术批判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政治批判，逐步实现了由学术批判向政治运动的转变。

1966年5月11日至6月11日召开的山东省委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是山东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标志。6月18日，山东省委再次召开由36,000人参加的开展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点名批判全省宣传、文化教育战线的13名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学者、权威”。至此，山东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基本结束，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

【大饥荒】

一九六零年（三）

——与苏联无关

陆 凌

“苏联老大哥”

苏共与中共的关系，起初是父子，后来是兄弟。再后来，兄弟阋墙，如今变成表兄弟了。

俄国十月革命，是对中国近百年的政治演变影响最大的历史事件。从那时起，中国开启了全盘西化的进程，由传统的“独尊儒术”逐渐变成独尊马列，1949 年后马列成为国教，从此“罢黜百家”。

苏联通过共产国际，输出革命，操控中国内政，煽动叛乱，支持割据，直至提携中共，颠覆了当时中国的合法政权。没有苏共，就没有中共，更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斯大林为父，毛为子，斯大林并不喜欢毛。1953 年，斯大林去世，毛终于解放了。¹

（下图：由苏联国旗衍生出来的中共党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¹冯克：Mao's Great Famine-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第 3 页，Walker & Company, New York, 2011。

赫鲁晓夫当了大哥，毛升级为小弟。大哥做事不够稳重，当家不久就刨了老爹的坟，19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事有点乱，小弟颇有微词但还是力挺大哥，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在1957年底达到顶峰，此后，中苏关系就开始走下坡路。1958年，哥俩为电台舰队的事闹得不开心，8月份毛向宿敌蒋开炮，居然事先没和大哥打招呼，1959年，为了公社和中印边界的事，小弟对大哥的态度立场十分不满，1960年4月小弟公开叫板，大哥回手给了一个大耳光（6月布加勒斯特围攻中国），小弟硬拼死扛，大哥又是当头一棒（7月撕毁合同撤回专家），弄得脸皮撕破，兄弟失和。此后，兄弟之间虽还有来往，但已形同陌路，1966年，两党关系中断，1969年，珍宝岛兵戎相见，兄弟大打出手，反目成仇了。

不管兄弟俩怎么闹，小弟自家的日子没过好，揭不开锅饿死人了，就怪大哥，说不过去。且不论小弟忙着成家这二十几年老爹的功过是非，就说成家以后这八九年，老爹和兄长都是非常帮忙的。小弟刚成家时，一穷二白，老爹很慷慨，要钱给钱，要人给人，援建项目156个，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就是那时候打下的。后来，大哥对小弟也够意思，原子能火箭航空这些当时的新科技，有的是大哥主动送，有的是小弟张口大哥给。薄一波说，不要忘记斯大林，不要忘记苏联人民，不要忘记那些来华帮助过我们的苏联专家。¹还算有点良心。

但是，后来把三年大饥荒的罪责往苏联人身上推，就是忘恩负义。中共黔驴技穷，实在找不到别的更好的借口，正好当时和大哥闹翻，恼羞成怒，索性就把这盆脏水，顺手泼到苏联人的头上。1978年，布热津斯基注意到，邓小平很烦越南人，谴责越南背信弃义。²不久，中越爆发边境战争。回头想想，六十年代初苏共高层对于中共的看法，和七十年代末中共对越共的看法，应该是一样的。

清官难断家务事，更何况社会主义这么个大家庭。我们就事论事，来看看所谓“撤走专家撕毁合同”、“苏联逼债”是怎么回事？对“三年大饥荒”究竟有无影响？

¹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21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

²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第234页，冯克利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

1. 撤走专家撕毁合同

1960年6月22日，布加勒斯特，赫鲁晓夫指着彭真的鼻子说，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的要命。你们搞百花齐放，现在怎么样，还放不放？你们那么爱斯大林，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你们老讲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你们中国想压倒大家，要压倒全世界。¹

彭真与赫鲁晓夫公开硬顶。6月26日，在51党代表会议上，彭真作了尖锐而激烈的即席发言，说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²赫鲁晓夫这头驽驴，只讲实力，没有原则。³他对中国人已经忍了很久了，不给老子面子，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专家。7月25日，没等中方答复，苏方又通知，决定自7月28日至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1390名，终止派遣专家900多名并撕毁343份专家合同，废除257个科技合作项目。这些专家分布在中国

经济、国防、文教和科研等部门的250多个企事业单位，担负着重要任务。⁴



这就是令中方错愕万分、措手不及的“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事件。斯时，中共对苏共的态度，应该是相当纠结。硬顶不成，又软不下来，打不过人家，又不愿认输，现实需要苏联，理想却又摒弃，进退两难，欲罢不能。结果，被赫鲁

（上图：鲁莽蛮横的赫鲁晓夫）晓夫将了一军，下了狠手，这盘棋中共输得很惨很难看。

赫鲁晓夫这么做，苏联外交部是强烈反对的，不留后路，后遗症太大，大大降低了苏联以后对华的掌控和影响，还给了中共一个绝地反击的契机：激化的外部矛盾永远是转移国内危机最好的借口。果然，中共几乎马上就这么做了。1964年，中共气愤地对苏共说，在中国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你们乘人之危，采取这样严重的手段，完全违背了共

¹ 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第580页，香港中文大学，2008。

²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267页，人民出版社，2009.5。

³ Lü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第192页，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⁴ 林蕴晖、丛进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第187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8。

产主义的道德。¹

由此看来，“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是真，但断言因此而导致“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为伪，理由如下：

第一：时间不对。赫鲁晓夫突然任性地惩罚中国，发生在1960年7月中，在此之前，苏联还是一心一意地帮助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知道，大饥荒始于1959年春，到1960年夏，三年饥荒已经过半，怎么能赖苏联呢？1960年干的坏事如何影响到1959年的肚皮？

第二：领域不对。饥荒是农业危机造成的，苏联当时援建的项目基本侧重于工业、国防、文教和科研等部门，基本与农业无关。老赫那么干，的确是乘人之危，但他没有对饥民落井下石，亿万中国农民食不裹腹，与毛也许有关，与赫绝对无关。

于幼军认为，苏联政府撕毁援华经济合同撤走专家，与中国发生严重经济困难有个“时间差”，而且在内容上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把中国发生三年大饥荒归咎于苏联，实在是牵强附会。²

有关苏联的谎言很多、流传很广，再说说“苏联逼债”。

2. 苏联逼债—子乌虚有

赫鲁晓夫是头驽驴，毛是头倔骡子，1960年夏，他们顶上了。赫翻脸撤人，毛很生气，死了赫屠夫，不吃带毛猪！不仅要炼争气钢，还要“争一口气”，提前还清苏联的债。

7月初中共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16日得知苏联釜底抽薪，十分愤慨。18日，毛问周恩来还要多少年还请苏联欠账，周说16年或10年，毛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时好多了，勒紧裤腰带，争取5年还清。果然，5年全部还清了。

这里要看仔细了，是毛主动提出提前还债，不是赫鲁晓夫上门追债。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研究者没有发现任何苏联逼债的文献记载。冯克说，俄国人从来没有要求（中国）加速

¹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268页，人民出版社，2009.5。

²于幼军：《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第414页，广东教育出版社，2011.4。

还债。相反，1961 年 4 月，苏方同意把中方未付的 2.88 亿卢布再融资，分 4 年还清。¹驻苏大使刘晓回忆说，（1961 年）苏方主动提出在中苏贸易中，中方的十亿卢布逆差可分 5 年偿还，不计利息。

到今天，如果问那些大饥荒中幸存下来的普通中国人，什么原因让他们 1960 年挨饿？答案几乎都会指向苏联。说政府欠了苏联一大笔钱要还，农产品都要上交，生猪家禽粮食都给政府还苏联的债，苏联逼迫中国还债。²

令人惊讶的是，不仅传说与事实有出入，历史的事实恰恰相反。1961 年，中国在国际上承认经济困难粮食短缺后，苏联不仅主动宽限部分贷款的还款期限，赫鲁晓夫本人在 2 月 27 日，亲自写信给毛，提议在 1961 年 8 月底以前，借给中国 100 万吨谷物（30 万吨小麦，70 万吨黑麦）和 50 万吨古巴糖。周恩来 3 月 8 日口头致谢，同意接受 50 万吨糖的援助，谷物则作为后备粮。³

再用具体的数字明确驳斥这无德的谎言。1960-1961 这两年，中国对苏联出口，无论是农副产品，还是粮食及食用油，与 1959 年相比，没有上升，都在下降。特别是粮食，1959 年中国对苏出口 141.8 万吨，1961 年骤降至 12000 吨，比 1959 年的零头还要少。

表格 3-1：1957-1961 对苏出口主要商品类别统计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中国对苏出口总额	672	809	1006	737	483	441
工矿产品	223	234	218	183	140	116
农副加工产品	227	346	460	386	304	296

¹冯克：Mao's Great Famine-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第 106 页，Walker & Company, New York, 2011。
²冯克：Mao's Great Famine-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第 107 页，Walker & Company, New York, 2011。
³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 127-8 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年 3 月第 2 版。

农副产品	223	229	328	168	40	30
------	-----	-----	-----	-----	----	----

表格 3-2：1957-1961 对苏出口的粮食及食用油数量¹

单位：千吨/百万卢布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金额	重量	金额	重量	金额	重量	金额	重量	金额	重量
粮食	77	806	100	934	147	1418	66	640	1.2	12
大米	25	201	54	437	88	784	33	285	0.2	1.8
大豆	49	570	45	489	59	634	33	355	0.9	10.4
食用油	24	57	23	72	28	78	15	41	0.4	0.4

赫鲁晓夫撕毁了合同，撤走了专家，但饥荒与他无关，他也没有逼债。让赫为中共背大饥荒这口黑锅，真够冤的。可是，认真想想，大饥荒弄得那么严重，旷日持久，长达 3 年，还真与苏联“有关”。

3. 与苏联“有关”

1960 年，赫鲁晓夫的鲁莽行动，进一步孤立了毛。“毛与苏联决裂，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国家。”²面对饥荒，自尊与恐惧让中国不愿从社会主义国家进口粮食。³试想，如果中苏 1960 年没有决裂，如果中国当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还有一批友好国家，如果中国当时能够自信地、殷切地、以人为本地呼吁国际援助，虽然这一切无法阻止大饥荒的发生，但是，饥荒烈度是否会大幅降低？时间跨度是否也会大幅缩短？答案是肯定的。从这个意

¹冯克：Mao's Great Famine-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第 76 页，Walker & Company, New York, 2011。

²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第 34 页，冯克利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 年。

³冯克：Mao's Great Famine-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第 111 页，Walker & Company, New York, 2011。

义上来讲，三年大饥荒与苏联还是有点关系的。

左图：中国设计的“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周年”（1944-1964）邮票，这个“山鹰之国”曾被毛称为“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是当时中国在欧洲唯一的友邦。1961年中国饥荒严重，仍然赠送阿尔巴尼亚6万吨粮食。¹



中苏分歧、中苏论战、直至中苏分裂，似一根红线，贯穿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及整个六十年代中国的政治进程，它主导了当时的中国外交，对于中国内政也有着重大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内部政治逐步激进化，又加剧了中苏矛盾，两者互为因果、

错综复杂。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中断援建只是中苏同盟坍塌的开始，是中苏经济合作的崩溃。其后，随着两党关系的持续恶化，两国军事同盟的消亡，1950年签署的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条约，到1966年已是名存实亡。

从“一边倒”到分道扬镳，从同志加兄弟到反目成仇，从盟友到敌国，仅走了不到20年。这是为什么？许多人（尤其是中方）谴责苏联怪罪赫鲁晓夫，国外有些学者认为，中苏分裂，是冷战时期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冷战，奉行原教旨马列主义的毛及中共主要领导人难辞其咎。

1957年夏，中国政治由于反右向左急转，与此同时，莫斯科发生的反赫事件失败了，苏联继续在去斯大林化的道路上前行，由此，中苏在意识形态上背道而驰。²1959年后，毛考量中苏同盟对中国的价值，认为它已走到了尽头，最终将同盟关系推向崩溃。³从实用角度看，当时，毛在搞大跃进、抛弃了苏联经济模式，苏联因为东欧，对华经援有所节制，

¹冯克：Mao's Great Famine-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第113页，Walker & Company, New York, 2011。

²Lü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第47页，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³Lü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第2页，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中印冲突，苏方表现令毛失望，苏美缓和，意欲遏制中国，苏联之于中国，好像已无关紧要。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赫氏去斯大林化的所作所为一直让毛如鲠在喉，赫氏倡导和平共处和平转变又矮化了毛的革命法宝，让毛有不吐不快、一争高下的冲动。从民族主义角度看，苏联试图强化中苏军事同盟的若干举措令中方极为不安，反应过度。

因此，基本可以推论在中苏之争中，毛的确占据主要与主导地位。如此看来，所谓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实为一面之辞，而苏联逼债导致大饥荒之说，更为无稽之谈。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整个1960年，中苏争斗日趋激烈，一大批中共要员的注意力被这个焦点问题所吸引，忽视了国内问题。¹心有旁骛，对农业危机，农村饥荒，农民挨饿，反应迟缓，延误时机，造成饥荒绵延。这也算与苏联有关。

有人问，中苏论战中，中共领导人，尤其是毛，究竟是把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真诚的信念体系，还是当做一个权争的手段？没有证据显示毛和他的战友们是一群纯粹自私自利的人，以欺骗的手法利用意识形态的说辞，来达到违背马列教条的目的。²这是一个令人叹息的分析，这些真诚的共产党人，虔诚的马列信徒，为了理想，不畏牺牲，投入毕生的精力，却弄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国际上，陷入孤立，岌岌可危。

没有外患，没有内乱。不怪老天，不怨老大。和平时期，正常年景。饿死千万人的三年大饥荒，究竟是怎么造成的？谁的责任？连红二代自己都不能不问，怎么向历史交代啊？³

大饥荒，谁之过？ ■

¹ 麦克法夸尔：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第2卷，第293页，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² Lü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第347页，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³ 《人物周刊》，总第253期，“秦晓-做一个体制内的改革派”，第45页，2011-05-16。

【述 往】

家世拾零

——我的爹爹和父亲（二）

慰 祖

五、被扭曲的亲情

文革之初，父亲一直被关押不让回家。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我们兄妹一时都不知如何面对父亲，亲情显然已被阶级斗争的观念所扭曲。有一天晚上，不满13岁的三弟和11岁的妹妹正坐在小屋的床上玩耍，突然门被推开，是父亲回来了，他一脸笑容地看着多日未见的孩子，可能以为他们会惊喜地扑过来。可这两个孩子却完全傻了，面对眼前作为“阶级敌人”的父亲竟然呆若木鸡，连一声“爸爸”都叫不出来。父亲尴尬失望地收回笑容，一句话也没说，退身出去关上了房门。兄妹二人重又陷入深深地沉默之中，只感到天上的乌云就像磨盘一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弟弟妹妹一直忘不了这一幕，忘不了爸爸当时的眼神，忘不了小屋里那压抑得让人不能喘息的空气，责备自己为什么不能还给爸爸一个笑容，让他在受到折磨后能够得到孩子的一丝安慰。

后来在一个白天的下午，父亲又回来过一次，那天只有家母和妹妹在家。那时妹妹对家里的现状已适应一些，也能坦然面对爸爸了。父母亲在里屋说话，见妹妹在外屋就把她叫了进去。父亲把妹妹抱起坐在他腿上，这在以前是非常自然的事，可妹妹此次却如坐针毡，又不敢动，只得僵硬地一动不动。忽然听到父亲对母亲说：“我晚上失眠，每天要一片安眠药，但都没吃，现在已经攒到15片了。”母亲突然压抑地啜泣起来，11岁的妹妹虽听不懂，但却更加害怕，感到这一定不是什么好事。那时只是觉得爸爸和妈妈太可怜了，以后听说有吃安眠药自杀的事后，才脑袋里“嗡”的一下，为父亲吓出了一身冷汗。

一天，被关押多日未见的父亲突然回到家，他是专门请假回来写“认罪书”的（题目为：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请罪书”）。因为在被关押的“牛棚”里（现在的人们知道文革中各个单位的“牛棚”是特指什么吗）没有写作条件。父亲写了一整夜，早晨起来，我看到父亲的卧室满满一地全是烟头。临别时，父亲特地把我叫过来交代后事：我经常被他们殴打，实在是无法忍受了。如果他们再打我，我就准备一死了之。今天有可能是最后一面了，你是长子，要协助妈妈照看好这个家。家母一听顿时哭了起来。我完全蒙了，无法判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做任何表示，脑子里一片空白（书写至此，我的心仍在滴血）。

建国后过度的政治化不仅制造了各种运动被整者的巨大群体，还使他们的家庭受到深入及心灵的政治株连。如家庭政治符号化：从家庭成员的纵向关系来看，家庭的阶级符号如地主、富农、资本家、小业主，政治符号如国民党、三青团、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这都是党组织和政府分配政治资源、社会资源的基本依据。家庭出身被政治符号化，其对子女的影响就会被放大、固化。当家庭的政治标签被无限放大之后，家庭的其它功能也就模糊淡化了。许多家庭已经不再是其成员的情感得到慰藉，人格得以稳定的最后的温馨港湾，亲情被严重扭曲。

极度的政治化把对家庭本体价值的伤害推向极致：只要家里有了政治运动的对象，其家庭就会被污名化，家庭成员就要被迫与其划清界限。这就意味着要割断家庭成员心灵深处的情感联系，家庭关系完全异化。划清界限的具体标准是：一是要揭发其罪行；二是视之为仇讎，上纲上线批判。在那个愚昧、荒唐、悲惨的年代里，兄弟阋墙、夫妻反目的亲情悲剧比比皆是。影片《归来》就描绘了女儿为了出演女主角而揭发出卖父亲的情节。这样的事在文革前屡见不鲜，在文革中更变本加厉。有一种引导、纵容、鼓励、挑唆儿女仇视政治上异类的父母的社会氛围和意识形态。这些亲情悲剧对家庭本体价值的伤害，其范围之广、创痛之巨，亘古未有。它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当代创伤性记忆的主题之一。

1968年的8月，我即将赴内蒙古草原插队，父亲再次请假回家为我送行。父亲问我，你吃得惯羊肉吗，我说没问题。父亲说：那还不错！在饭桌上，父亲流下了泪水：好不容

易望子成人，如今长大了，却要去那种地方！

我下乡插队以后，父亲经常来信，说很多次梦见我在茫茫荒野中与风雪搏斗，醒来泪水已打湿了枕巾。父亲还叮嘱我切勿“深入宝山，空手而归”，一定要好好了解民情，多做调查研究，多思考，勤动笔，争取写出一篇《内蒙古牧民考察报告》提供给中央参考。父亲的建议未免是纸上谈兵，但他是希望我能用这种方式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以改变我的处境或找到一种出路。深情父爱，跃然纸上！而我自幼就深受忠诚和盲从教育，被灌输了满脑子的阶级斗争理念，仍然还是个喝过狼奶、被洗了脑的毛头小子。初到草原时，竟然还给在内蒙古哲盟开鲁县下乡插队的大弟写信，表示我们应该与父亲在思想上划清界限！

在草原下乡插队回家后再次见到父亲的时候，我才对父爱有了深深的感受。我从草原带回了一身虱子，从澡堂回家后倒头就睡，醒来后才知道父亲把我所有的衣服都煮了一遍。我们受了那么多的苦，有谁会像父亲一样刻骨铭心地惦念和关爱过我？人们所一再宣扬的党和领袖的关怀在哪里？那些整日高唱阶级斗争有理的人管过你吗？

六、我们家一分为五

1969年6月，母亲被迫丢下在北京的家，随纺织工业部的数百名下放干部一起去了位于湖北安陆农村的“五·七”干校。

1969年底，父亲所在的学校从北京迁往江西分宜县农村，三弟和妹妹也只得离开北京，去湖北安陆农村的“五·七”干校与家母汇合。

从此，我们家就一分为五，骨肉离散：祖父早在文革初的1966年9月就被红卫兵赶回了湖北天门老家；我和大弟在1968年的8月和10月分别去了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和哲里木盟下乡插队；妈妈和三弟、妹妹去了湖北安陆农村；父亲去了江西分宜农村。

当时，母亲在安陆“五·七”农场五公里半，三弟在农场六公里半，妹妹在县城里上中学，后来二弟到安陆进厂，每人都住在各自的单身宿舍里。只有周日全家才能见上一面。

这在当时那个年代也是少见的。妹妹在安陆的同学中，最起码父母都是住在一起的，未曾像我们家分裂得这么彻底。

在这之后，父亲所在的学校有几个干部，因妻子儿女在湖北安陆，申请转往安陆所在的纺织工业部“五·七”棉纺厂得到批准。父亲也想去安陆与家母汇合，父亲的老上级、原纺织部的老财务司司长只说可以来农场参加劳动，未提可以进设在县城的“五·七”棉纺厂工作，父亲遂作罢。

一年后，父亲所在的学校迁回北京。临行前，军代表突然找父亲谈话：分宜有一家新建的工程塑料厂财务状况混乱，希望学校支援专业干部。考虑到你曾经长期从事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经验丰富，现决定你留下来去那里工作。军代表连哄带骗：学校迁回北京后就要解散，员工要重新分配。你是湖北人，留在这里吃大米，总比将来分配到东北或西北要好些。父亲鉴于1957年反右和文革中的遭遇，实在是失去了抗争的勇气。当全校师生员工欢天喜地登上回京的列车时，只有父亲孤身一人去为他们送行。父亲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已经装上火车的行李又被翻检找了出来，卸下车，然后凄然地目送着列车远去。

1971年的春节，我困在锡林郭勒草原难以回家。父母亲带着三个弟弟妹妹回湖北天门老家省亲。父亲给我的信中说道：离别20年，此次返乡，不知流了多少欢喜和悲伤的泪。此一去不知何年再归，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

后来，大弟和我先后从内蒙古农村转到湖北安陆，兄弟三人进纺织部“五·七”棉纺厂务工；家母和妹妹去江西分宜与父亲汇合。原先一分为五的家庭演变为一分为三：祖父在老家天门的姑妈家，由父亲每月汇款供养。

此后，我们兄弟三人，就在湖北安陆和江西分宜之间的铁轨上，来来回回辗转奔波了7年。从安陆首先沿汉丹线乘火车到武昌，再沿着京广线南下到长沙或株洲，转浙赣线到江西分宜。行程650公里，两天两夜。回来的路线也一样。

长沙是我们的必经之地，来来回回去过十几次。湖南第一师范、岳麓山爱晚亭、湘江橘子洲头、清水塘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五一广场……都走遍了。

江西分宜乃贫困之乡，物产还不及湖北的三等县安陆。安陆的农户普遍大量养鸡，鸡蛋最便宜时6分钱一个，冬天8分一个。“腺鸡”（被阉割后的公鸡）7毛钱一斤，母鸡9毛一斤，鲜美的甲鱼最初是3斤粮票加5毛钱一斤，合8毛（一斤粮票合一毛钱）。但很少遇到，后来也涨到9毛甚至1块钱一斤了。每年春节去分宜探亲，我们都要携带成百个的鸡蛋和几只阉鸡，如果临上车的前两天能买到活鸡和甲鱼，那就再好不过了。含辛茹苦的妈妈，一年到头朝思暮想，就是盼望儿子来探亲。每念及此，我常常禁不住泪水盈眶。千里奔波，两次辗转换车，如何将成百个鸡蛋完整无损地安全带回家中？我们因此想了许多办法。先爬到厂里食堂的冷库顶，将冷库墙壁夹层里的稻糠装一铁皮水桶提下来，然后一层稻糠一层鸡蛋地码好，装满整整一水桶，再去找一块三合板或五合板做盖子，用废旧的细纱机锭子传送细条布带密密麻麻的捆好，就可以上路了。千里迢迢一路颠簸，回到江西分宜的家里打开检查，往往只是水桶边缘的几个鸡蛋被碰破了。探亲结束回安陆时，就在水桶里装上一些江西的冬笋提回来。回到厂里以后，就赶忙避人耳目，在宿舍旁边找一个阴暗的角落，将冬笋埋在潮湿的泥土里，到周末再挖出来做油焖笋吃，奇香无比。

安陆“五·七”棉纺厂系中型国有企业，职工住楼房，有自设的医院、学校、公共浴室和供应蜂窝煤的煤场。我夏天在厂里食堂做防暑降温工作，制作冷饮供应全厂。有一种橘子汁包装桶，方形的白铁皮材质，可以装几十个鸡蛋，轻便适用。我就用自己制作的冰棍“贿赂”厂里相熟的钣金工，请他敲制几个铁皮盖子，装上鸡蛋和稻糠后仍然用废旧的锭子带捆好，再做出一个提手。这比携带水桶更方便，也不用再把桶带回来了。你可能想不到的是：这些白铁皮桶一直用到了现在，妈妈家至今还在用它装米。

原先就在我家附近，位于北京三里屯的轻工业部发酵研究所，在文革中搬迁到江西宜春时研制了一种四特酒，口感绵柔醇香，喝多少都不“上头”。南方的冬日阴冷潮湿，寒气入骨，在阴雨连绵的时节冷得人簌簌发抖。屋内小小的蜂窝煤炉和木炭盆散发的一点热气，根本无法御寒。我们兄弟三人，常常喝着四特酒吃鲜美的江西冬笋，那感觉简直如同神仙一般。一年到头，12天的探亲假加上春节，是我们全家最快乐的时光。四特酒至今

还是江西名酒，我偶尔还喝过一点点，但却找不到当年的感觉了。

我们去分宜探亲，当然不可能只是喝酒吃冬笋。酒足饭饱之后，三个大小伙子主要就是做两件事：劈柴、制作蜂窝煤。父亲一介书生，这种事情当然是由我们来做。当地老乡从山间砍下干树枝，再用板车拖到街上出售，以换几个零钱。劈柴不难，我们都是熟练的工人，细树枝锯成一截一截的就可以用了。比较粗大的树枝，锯成一截一截以后，要用斧头劈为两半或三瓣、四瓣。蜂窝煤的使用传到南方以后，人们纷纷自己制作。有一种专门制作蜂窝煤的手工模具，操作简便。刚开始因不够熟练，我的手上还磨出了水泡。蜂窝煤炉子主要用于烧水和焖饭，冬天取暖。烧菜主要还是靠木柴，因此，家家户户都在后门盖一个足以避风遮雨的席棚，盘上灶台和烟筒当作厨房，并堆放干柴、煤炭和制作好的蜂窝煤，以免雨淋。

湖北安陆“五·七”棉纺厂的北京籍青工，部分人有机会回北京探亲，他们当然是最令人羡慕的。原纺织工业部的干部中也有人调到其它城市工作了，他们的子女就去那里探亲。而当年探亲时从县城到县城的，只有顾氏兄弟和我们兄弟两家。当然这也是无奈的。闲暇时，父亲多少有些凄凉地对家母说：“将来退了休，我们大概还是会去安陆和儿子过吧。”意欲叶落归根于湖北老家。

七、老家天门之行

初到湖北安陆，与祖籍天门近在咫尺。我们学徒工也没有探亲假，我于是决定和三弟一起，利用1973年春节的几天假期回老家看望祖父。安陆离天门虽不远，但却没有直达的长途车。我们先乘火车到云梦，乘长途汽车到皂市，再从皂市转车到达天门县城。

先到舅舅家。舅妈告诉我们：祖父回乡后，当地又将其再次定性为“地主分子”，作为“黑五类”分子，还经常被叫去“听训”：“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祖父回乡后栖身于天门县城的小姑妈家，因为这总比农村大姑妈家的条件要好一点。父亲每月给

小姑妈寄15元生活费，腊月加倍。

祖父大概是重男轻女，对两个女儿婚事的处理不够慎重。父亲一提起此事就连连叹息，两个姑妈对祖父昔日给她们操办的婚姻也都心怀怨恨：因为按照祖父当时的家境，完全可以找一个比较富庶的人家把女儿嫁出去，这样也可以让姑妈们在婚后过的好一点，这显然是对女儿一生的幸福考虑不够。祖父在这个时候突然回乡生活，是小姑妈极不情愿却也不得不接受的。

在文革的那个年代，地主祖父的“意外”返乡，当然也给小姑妈一家的生活带来了“麻烦”。小姑妈和她二女儿一说起来就连声咒骂，我也只好听着。小姑妈的二女儿没当上红卫兵，班干部被撤，没能上高中，全都归罪于祖父（后来听说其实也有其个人因素）。小姑妈的二女儿还说，爹爹（湖北方言：祖父）整天“讲经”，说些上海啊，北京啊，没有听过的事情。十分意外的是，小姑妈的二女儿居然告诉我：有两个梳着小辫，操着北京口音的姑娘在三年前曾经来天门找到爹爹，说我们是和你孙子一起在内蒙古下乡插队的。因为其时我参加了公社专案组的工作，正在河北调查本公社一些“外来户”的来历。当时知青同学中有传闻说我爷爷是地主，但无法确定。作为地主的孙子是不能参加专案工作的，所以公社专案组就派了两个知青来调查祖父的阶级成分。十分巧合的是，此前父亲所在单位也派人到天门去调查祖父的阶级成分。这个人调查回来后，居然在私下里悄悄问父亲：“你父亲到底是不是地主？”搞得父亲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一时也无法判断此人提问的动机。如果直接否认就成了翻案，否定“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成果，那就是罪加一等。父亲只是感到疑惑：你去调查了半天，是不是地主你自己还不清楚？为什么要来问我这个当事人？其实按照周有光先生的观点：地主是农业生产的投资者，设计、组织、管理、指导者，是旧中国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对旧中国农村经济生活中什么是剥削，从来就没有过一个科学准确的表述和定义，因此，对什么人地主或富农，也就从来没有过一个科学准确的表述和概念。

我把在内蒙古草原穿过的旧皮袄和皮裤带到了天门，权当给祖父做御寒之用。皮袄又

脏又破，皮裤还比较完整。舅妈就反复提出要把皮裤留下来做个背心，我也只好答应了。但一想起来心里就不舒服：孙子拿来旧衣给爷爷尽点孝心，当舅妈的从中横插一刀，这算什么事啊。

我们的回乡之行不事声张，不敢让厂里和老家的人知道有两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在过年时来看望了祖父。安顿下来后，我们趁着夜色悄悄前往祖父栖身的小姑妈家。祖父已早早睡下，在昏暗的灯光下，当从小就熟悉而数年未见的祖父披着衣服出现在堂屋的时候，听着小姑妈二女儿不停的骂声，我不由得失声痛哭：“爹爹再不好，也是爹爹啊！”82岁的祖父也连声说“我的伢啊，特地来会我的啊，特地来会我的啊”。舅妈、小姑妈和其二女儿也在一旁流泪。祖父依然头脑清楚，问我：“听说你去了蒙古？”“那不是很冷？”我告诉他，我现在安陆。年轻时就经常出门的祖父对安陆的方位非常清晰，小姑妈的二女儿在旁连声提醒：不要和爹爹多说，免得他又出去和别人乱讲。小姑妈和她二女儿对祖父的那种凶狠，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但祖父对此却没有什么反应，面无表情，看来他早已习惯了小姑妈母女的这种态度。第二天又去看爹爹，祖父说你给我的皮袄怎么是湿的？我嘱咐爹爹，在出太阳的时候拿出去晒一晒。爹爹说手冷，三弟给了他一副劳保帆布手套，爹爹很高兴。

小姑妈招待我们吃饭，祖父平时根本吃不到什么菜肴，每顿饭就是一点辣子豆豉，我一边给祖父夹菜，一边又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祖父嗜酒，在老家的那种境况之下，老人家也不可能喝到酒，我就买了几瓶半斤装的白酒（也不是什么好酒），塞在了爹爹的被窝里，接着又塞了几块钱。

在天门老家有舅舅家和姑妈家两房亲戚。舅舅家这边过年聚餐，总是一片欢声笑语，而姑妈家这边却是凄凄切切，气氛沉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祖父最疑惧的是死后被火化，几次向我提及。文革期间也没有人敢给老人准备棺木，更何况是一个“老地主”了。我作为长孙在当时对这样的事情连想都不敢想，如今念及仍令人伤感。

后来还曾看到爹爹在寒冬的露天席棚厕所里出恭，那一幕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事后爹爹还对我说想喝点通便的蜂蜜，我拿出钱来请小姑妈买了一点。我一直后悔当时没有给祖父多留点零钱，因为父亲每月寄来的生活费，是绝然到不了祖父手中的。父亲对祖父的遭际，对小姑妈的刻薄，当然是清楚的，但作为一个已被发配到千里之外江西分宜小城的“摘帽”右派，也无可奈何。父亲后来给我回信：读罢会面情景，不禁泪水潸潸……

我们在天门还去看过在乡下的大姑妈。大姑妈夫妇和其子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后来，父亲还曾要我们兄弟把大姑妈送到江西分宜小城的家里住了数月。

凄凄惨惨的天门之行，祖父的境况令人忧伤，几个亲戚令人不快。回到安陆，那些天的场景时时在脑海中重映。我无法与祖父再通音讯，也从未向人讲述过此次的老家之行，就让这一幕深深地埋藏在了内心之中。政治运动对亲情、人情无休无止的摧残，对人权残忍粗暴的践踏，令我刻骨铭心。

1975年，84岁的祖父在孤独中辞世。父亲和我们都未能前往奔丧。

改革开放以后，精明能干的小姑妈沿袭爹爹的经营能力，从服装销售起家，赚了一笔钱，盖起了一座大屋，可以和土改时被没收的祖屋相媲美。1979年落实政策，借纠正祖父被错划之机，小姑妈一家积极努力，最后好像共退赔了1700元。父亲将这笔只相当于当年被没收财产零头的血泪钱做了分割：大姑妈、小姑妈都留有一份，小姑妈的大女儿一再来信称功，所以对在落实政策时前后奔忙出力最大的小姑妈的大女婿，特别予以了一笔较大的款项。

我退休以后，作为长孙曾有过代表全家回乡祭祖的念头，辗转询问小姑妈的二女儿：爹爹葬在哪里了？答曰：不知道。她并非像我一样从小就与爹爹相随，也没有什么祭祖的观念，大概也就没有关注过此事，确实是不知道。还有一种说法是：当年他们就是随便找了个地方，将爹爹的骨灰悄悄地埋了，以后也没有去扫墓祭奠过，后人也就不知道具体方位了。小姑妈的大女儿和小女儿来北京旅游时看望过我父母，家母也没有叫我过去与她们会面。从此，我与老家就基本没有什么联系了。

八、回到北京

文革结束以后的1978年，大环境有了很大变化，我们兄弟也频频希望父亲能想法活动一下调动事宜。转瞬间离京已经9年，看到周围有的人逐渐调离，父亲也动过心思，但又苦于没有门路。1957年的问题尚未“改正”，哪个单位愿意接受一个“摘帽右派”？曾想调到新建的大型石油化工企业：江西九江石化炼油厂，结果被人暗中作梗泡汤。调回北京更是希望渺茫。父亲本来打算请假到北京去一次，其所供职的分宜工程塑料厂副厂长魏忠恕遂主动提供了方便：派父亲去北京出差，任务是利用在北京的老关系，给厂里搞一些计划外钢材指标。出差的具体时限自定，能否搞到钢材也不做硬性规定。在那个年代，父亲周围的基层干部中还是有不少善良正直之人。如分宜工程塑料厂厂长张传升，两任供销科科长李忠、潘德宝，金工车间主任马天喜等等。

1978年10月，父亲终于有机会来到阔别的北京，四处找人活动，寻觅调回北京的机会。找到一个原二轻部的副部长开具了调京所需要的有关证明。父亲曾借原北京籍青工刘欣如之母在轻工业部的办公室写请调报告，不到一个小时就写了十几张纸，让刘妈妈赞叹不已。

在困难重重、万般无奈之际，父亲最后硬着头皮，找到了北京市纺织工业局的党委书记兼局长李昭（胡耀邦夫人，耀邦时任中组部部长）。

当年在共产党内，还是有很多正派的老干部，光明磊落、胸襟宽广。父亲1950年代任京棉一厂财务科长时曾多次当面顶撞过时任厂长兼党委书记的李昭，20多年后再相见，李昭仍然非常热情。在了解到父亲的现况后，李昭当着父亲的面，马上给父亲原先所在学校的党委书记打电话：老马这么有能力的人，你们还要不要？你们如果不要，那我就不要了！学校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兰剑见李昭这么说话，赶忙连声说，我们要，我们要！这么一个电话，就把父亲调京的事情解决了！走出李昭的办公室，初冬的北风阵阵袭来，使人感到了

寒意。父亲不由得感慨：离京后在南方的江西生活9年了，未曾想又感受到了久违的西北风！但调回北京终归是有了很大的希望，心中又不免增添了丝丝暖意。

事后，父亲听当年在上海的老同事、市纺织局的总会计师陈荣曾说，当时位于顺义牛栏山的北京维尼纶厂缺一个财务科长，可以安排。

1979年春节过后，父母终于回到离别已久的北京。此后，我们兄妹四人也经过种种艰难曲折，陆陆续续回到北京。1992年，在历经26年的离散之后，除了已在湖北天门老家辞世的祖父，全家人再次在北京定居，开始了新的生活。与那些在天灾人祸中家破人亡的人们相比较，我们家毕竟还算是非常幸运的。■

【述 往】

《镇反纪实——我的劳改三十年》（四）

—— 皖北治淮

王丕忠

投入劳改

复判以后，惊魂略定。

监狱当局开始给已判徒刑的犯人放风。所谓放风，就是每天把犯人分批定时放出监房，到约十多公尺宽、五十多公尺长的大楼屋顶活动。四周围墙高约三公尺多，墙顶有电网，屋顶空旷无物，想是专为放风之用。屋顶的一端，有一岗亭，高出围墙，上面有武装人员看守。每次放风约半小时，犯人沿着四周围墙跑步。一开始有的人跑不动，有的人甚至走路都勉强，经过了多次放风，情况渐渐好转，对粗劣的饭食也渐觉有味，各人的精神体力都显著增加。虽说放风的目的并不是为犯人们的健康着想，然而确实有利于犯人们的健康。

犯人们不久将投入劳改，而且是去远离市区车船达不到的地方，须靠长途步行。如果走不动，本人将受尽苦难和折磨，对当局也是一桩累赘的麻烦事。

在这段时间里，典狱长对各楼的犯人训过多次话，鼓励大家积极投入劳改，争取政府对大家进一步的宽大。他说刑期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各人的表现，可以减刑以至提前释放，告诫大家不要悲观失望。大家对他所说的话也深信不疑，心情从而比较愉快。据我所知，判处长期徒刑的人，多数不致服满刑期的，尤其是政治犯服刑期的长短，伸缩性更大。因此认为投入劳改后，提早恢复自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有了这一盼头，思想上轻松了很多。

有一天在学习的时候，下达通知，每人可写信给直系亲属，要求接济衣服鞋袜等生活用品。反革命犯自被捕以来，没有也不许和外界任何人通信，现在忽然有这一机会，大家都喜出望外。可是高兴得太早，所谓写信只不过是在油印好的表格中各项日用品名称项目下，填上各人所需要的数字，此外什么也不准写，连收信人的姓名和地址都不许自己写，须别人代写。其用意不难猜到，无非是为了防止在信中用暗语或暗号向外界通信息——政府对反革命犯的防范是滴水不漏的。

我没有直系亲属在上海市，只有老父老母在家乡，经济又极度困难，决不能写信给他俩来接济我，因此我打算不写信。然而一想，我哥哥那时可能仍在上海市，住在亲戚家，把他作为我的直系亲戚，或许通得过，于是写信给他。按我的想法，他收到后当然会转告双亲，告慰他们我未被镇压，仍在人世。可是信写之后，如石沉大海，杳无信息，心想信一定没有收到，希望成泡影了。

不料过了几天，在绝望中，忽然收到外界送给我一个包裹，里面有单衣背心袜子等物。包裹布上写有我的番号和姓名，却没有送者的具名（按规定送东西的人不许具名），字迹娟秀，似乎是女性所写，决不是我哥哥的笔迹。我把所认识的人中可能送东西给我的人，逐个地想，可是都对不上号，苦苦思索，始终想不出是谁。据知当时要送东西给犯人，须在大门口排长队，等候达五六小时之久，而且要承担与犯人有密切关系的风险。因此给我

送包裹的人，虽不知是谁也不论是谁，我衷心感激，毕生不忘。那包裹布我一直珍藏，在苦难的劳改征途中，一直随身带着，不幸有一次失窃，包裹布和其他东西一起被偷去。

天气愈来愈凉，在监房中大家本来都是赤脚的，那时已顶不住了，须穿上袜子，身上也多添了衣服。窗外的树叶已变黄，估计时令已入冬。有一天晚饭后通知上大课，传达关于劳改的事情。大意是批准能去劳改的犯人，都是案情已经搞清楚、坦白交代表现好的人，名单是经过严格审核才决定下来的，能够得到这一机会是很不容易的。犯人们必须从心底里认罪服法，感谢政府，严守纪律，安心改造。在劳改中认真学习，努力劳动，彻底改造人生观和世界观，争取重做新人。现在名单已确定，队也已编好，就宣布名单和每人编入的大队、中队和小组，命令每人要仔细听，以免弄错。这次编队的人数约有一千多人。记得好像是编为两个大队，即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

编队后过了几天，一天晚饭后，忽然下达了一个紧急通知：要每人把自己的东西立即收拾好，当夜即出发去劳改。大家一听既紧张又高兴，久盼脱离牢笼，如今总算盼到了。好各人的东西都有限，收拾起来并不费事。不一会儿发下长布条作为捆背包之用。典狱长下令：每人只许带二十公斤的东西，多出的东西留下。有的人舍不得把东西丢下，死命地把背包打得紧，看起来小一些。其实所谓二十公斤的限度也只是个大约数，并不过秤。我的东西很简单，只有一条丝棉被、一条薄毯子、几件内衣裤、几双袜子，这些都打成一个不大的背包。另外还有饭具、毛巾、牙刷等装入一个小布袋，准备手提，这两件总共不过十多公斤。因为当时天气已冷，我的衣服不多都穿在身上了。那时我有些悲哀，别人的东西都比我多，我只有这一点点，天长日久，东西用坏了，衣服穿破了，将来怎么办？殊不知在艰苦的征途中，我的轻装却大占便宜，少吃不少苦头，否则我有被累垮以至拖死的可能。

在准备行装的混乱中约摸过了两小时，广播中宣布旅途纪律，总之是从严从细，不准这、不准那等等。又过了约一小时通知出发。人群一阵骚动，忙着背上背包，提起东西。有的人背包过重，自己背不上去，须别人帮忙。然后大家奉命按编队时所列名单，以小组

为单位，在走廊上排成二人纵队，走出大楼大门。幸亏这次调动没有上手铐，否则苦头要吃得更大。

门外已停着许多大警车，大家依次登车，每辆车挤得满满的。当时已是深夜，又逢下雨，天空一片漆黑，车厢内伸手不见五指。大家窃窃私语，都在奇怪为什么要在深夜而且是雨夜出发？一会儿车子开动了，大家以为是要开到火车站，因为火车站离监狱很近。哪知车子行驶了好多时还不到，那就不是去火车站了。最后车子终于停了，下车后有人认出是邻县的车站。犯人们下警车进入站台，在昏暗的灯光中列队点名后便登车。所乘的是铁皮货车，没有窗子，只有车厢四个角上面有四个透气洞，白天从中透进一些光线，使车厢中略可分辨人物。车厢中间放了一个大木桶，作大小便之用，幸亏有盖子，不然臭气熏人。那时估计已近破晓。大家经一整天一整夜的折腾已疲惫不堪，于是卸下背包作枕头和衣而卧。虽然身上、地上满是泥水，而且挤得伸不直腿，却都睡得很熟。火车还没有开，车厢内已鼾声四起。我自然不能例外，也进入梦乡。

我在隆隆的行车声中醒来时，阳光已从车厢的透气洞中射入。光线的斜度已高，估计已是中午前后。不久车速减低，随即停下，听到车厢的铁门外开锁的声音，车门打开了，灿烂的阳光和冷空气一下子进入车厢。不但大放光明，而且把污浊的空气冲掉。大家呼吸到新鲜空气感到非常爽快，随即听到外面有人在叫各小组长到站台集合。我那车厢好像是有三个小组，每组二十多人。小组长也是犯人，是上面指定的。被叫出去的三个小组长集合后回来，传达叫大家抓紧大小便，并且马上要开饭。我乘去大便的机会活动一下，一夜弯曲着身子睡觉，腰酸腿硬，很不好受，经这活动，略感轻快。不多一会儿开饭了，各小组依次出车厢到站台上吃饭。饭是粗米饭，还有咸萝卜干和开水，萝卜干带浓厚的鱼腥味。据浙江沿海的犯人讲是腌咸鱼剩下的盐水泡的萝卜片晒成的干，是废物利用。我嫌它太腥，难以下咽，只吃很少。余下的不舍得扔掉或给别人，存在口杯内。但有的人却吃得津津有味，浙江沿海居民对腥和咸是习以为常的。

饭后继续登程。车子开得很慢，而且逢站必停，一停很久。途中开过两次饭，情况与

初次相同。一直到第三天下午才到达目的地，是什么地方不得而知。只是因为火车停下，命大家下车，才知目的地已到。步行了一段泥泞的土路，虽不很长但十分难走，一双鞋沾满泥巴，提脚又重，走路又滑，这种经历我从未有过。

勉强走到一条大河边，登上船舱的木船。河道上停靠着几十条这种木船，一字长蛇阵，颇为壮观。这些木船没有动力，也没有人来撑，是几条船连在一起用小火轮来拖。登船后每人发给两个玉米饼和咸萝卜干，但没有开水，大家吃得又咸又渴。有人想出妙招，把鞋带扎住搪瓷杯从船舱窗户外舀河水喝。我有幸也喝到了一杯，如饮甘露。

天色渐晚，开船了。船舱的门和窗都被遮严，外面的情景一点也看不到。舱内有长条硬座，大家挤坐在一起，东倒西歪，渐渐睡着。第二天一早，天还没有大亮，船靠岸了。大家在瞌睡懵懂中登岸，步行了几十公里到达江苏泗洪县的双沟镇，略事休息，继续又走了几公里，到了淮河边，这里就是最终的目的地。

治淮工程

那地区是淮河与洪泽湖靠得最近的地点，二者被不到十公里的土岗隔开。犯人的任务是在二者之间开挖一条深沟，也可称为运河，把二者沟通。土岗虽只高二十多公尺，但是因为要从地平面起往下挖二十多公尺，因此从土岗顶挖到河底共计五十多公尺。河底虽只约五十公尺宽，但因很深，上端开口则须两百多公尺宽，工程很艰巨。这项工程名为“峰山劈岭”，作用是为了沟通淮河和洪泽湖。在雨季水涨时，淮河河水可经运河泄入洪泽湖，防止泛滥，洪泽湖起蓄水池作用。这段“峰山劈岭”工程，必须在雨季前完成，时间紧迫。所以集中了据说有十多万劳改犯来从事这项抢险任务。犯人的住所是离工地约二公里处的许多A字芦苇工棚。每人摊到的铺位只有约三十公分宽、八十公分长，并头睡是睡不下的，只有头和脚相间睡才能勉强睡下，要不是疲惫不堪是难以入睡的。饭食粗劣自不待言，要不是饿极了是难以下咽的。

这十多万劳改犯都是从全国各地分批调来。我所属的上海第一大队一千多人，担任工程总长度约十公里中的一百多公尺。劳动力密集程度可想而知。劳动时间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分两班。头班是从中午十二时到子夜十二时，二班是从子夜十二时到次日中午十二时。除下午六时和上午六时分别为两班进餐时间外，全是劳动时间，别无休息。这在一般的看法是不合情理的，但从对待劳改犯和任务紧急的角度来看，这是理所当然的。

劳动的主要项目是挖土和运土，另外还有各种杂活。开始时我们是从顶端开挖，泥土较干燥好挖，运土是自高处往低处运，也较省力。后来愈挖愈深，运土愈运愈远，那就愈来愈费劲了。尤其是在下过几场雨之后，泥土湿了，分量加重，又粘锹粘筐，装筐倒土都很费力，走路又滑，挑担子和推斗车十分困难，大大增加了劳动强度。大家疲乏之极，苦不堪言。但是队长和指导员等干部还嫌大家不出力，进度慢，死命督促。见到挑担子和推斗车跑得慢的人大声地骂，甚至用柳条抽打，情景犹如在电影中可看到的奴隶社会。事实上劳改犯比奴隶还不如。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对奴隶主来讲，奴隶还有一定的价值。劳改犯是人民的敌人，社会的渣滓，能利用姑且利用，否则消灭唯恐不及。

犯人们能在这样苦难和屈辱中坚持活下去，主要是想争取减刑，早日恢复自由，早日能和家人团聚。当时劳改干部一再宣称，政府要根据每人的改造表现如劳动成绩、劳动态度、靠拢政府、认罪服法等方面，分别给予加刑或减刑，表现特别好的可予提前释放。犯人住所工棚四周和工地上，到处贴满了“五月减刑”、“劳动中立功受奖”、“靠拢政府，积极争取宽大处理”之类的诱导犯人努力劳动的标语。此外还有高音喇叭播放革命歌曲和宣传队敲锣打鼓，鼓舞人心。工地上经常呈显出一幅沸腾景象。正如干部们常说的“劳动就得像个劳动的样子，应该是热火朝天，不能死气沉沉”。可是这所谓“像个劳动的样子”是以犯人们死命地干为代价的。

在渺茫的希望诱导下，犯人们就这样熬过苦难的日子。据干部讲：“这项工程在雨季涨水前必须完成，不然工作将更加困难，到时候还是大家吃苦头”。

这话不假，摆在眼前的事实就是这样。一般人的心理状态都希望工程能早日结束，早

日从苦难中解脱出来，于是竭尽全力地劳动，并自发地互相督促。有一些善于自我表现的人，也就是所谓“积极分子”，每当干部来到劳动现场时便没命地干，来博得干部的青睐，并大声吆喝督促别人，以示自己的积极。这类人大多身强力壮，横行霸道，大家都怕他们。这类人在监狱中和劳改队中普遍存在，这也是由于当局提倡和赞赏所致。

天气一天天暖起来，艰苦的劳动一天天在进行，河床的底逐渐加深。大约到了六月中旬，河床的深度已达十多公尺时，施工中发生一出惨剧：塌方。时间是在接近子夜两班劳改犯接替之前不久，大约在夜里十一时左右。

当时我正在挑担子运土，从河底挑上河岸装斗车后，空担往回走，忽然听到一声巨响，声音低沉，有如闷雷，抬头一看，前方约三十公尺处腾起浓烟，其实是尘土。霎时间从上面落下无数大小土块，较小土块滚到我脚背上，只擦破些皮，未受伤。同时附近工地的电灯一下子熄灭，幸亏有远处的灯光照射，四周的景象还依稀可辨。随后飞扬起来的尘土延伸过来，把我侵吞其中，便什么也看不见了，只听到人们的呼叫声，凄厉可怕。工地上本来就是高低不平，挑担子走的小道又是弯弯曲曲，再加满地土块，光线暗淡，我无法走动，只好原地站着。当夜风很大，尘土很快被刮走，才隐约看到前面堆起了大大小小的土块，大的有园桌面大。犯人们一片混乱，呼喊救人。按当时劳改犯密集的程度来看，塌方压伤的人不在少数。

过了不久，干部和解放军士兵提着马灯来了。在微弱的灯光下，大家用铁锹和铁镐挖土，想把压在土块下的人救出来。可是这种营救方法是没有把握的，因为不知道人压在什么地点，只是没有目标地乱挖一气。事实上也没有较好的方法，只有在边缘处还露出身体一部分的人，总算挖了出来。这次塌方，不但数量多而且落差大，在河底堆起的泥土有几公尺高，压在最下面的人，一时无法挖出来，即便没被压死也将闷死。我义不容辞，手中没有工具，只好用手来搬走土块，把已挖出来的伤者或死者和别人一起抬上河岸。我抬到一人，其实不应称“人”，应称“尸”。正好有干部提着马灯来照一下，察看他是死是活。只见满脸血污，形象怕人，七孔中好似仍在冒血。他穿着短裤衩，大腿上有一大裂口，深

及骨头，是被大土块坠下时的压力压开的。

在一片混乱中，接班的犯人来了，我们便交班回工棚。次日早晨起身后，队长便来训话，把昨天发生的重大工伤事故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只是说昨夜工地上发生塌方是由于劳改犯挖“神仙土”造成的。至于死伤多少人没有说，也没叫大家不要挖“神仙土”。所谓“神仙土”是指取土时只挖土壁下部，不挖上部，等下部挖空到一定程度时，上部的土壁悬空突出，在地心引力作用下，自动开裂落下，可省去许多挖土的劳力。这样挖目的是为了提高工效，加速工程进度，但这是违反操作规程的，因为有塌方的危险。犯人们企图省力和提高工效，挖“神仙土”是很普遍的，队部也从不制止。通常犯人们挖“神仙土”挖得不很深，土壁高度不过几公尺，塌方不致发生危险和伤人。这次挖得太深，土壁高达二十公尺，上端悬空突出，突然塌方，土块落下，压力很大，造成伤亡惨剧。队长指导员们只为工程进度着想，并不制止挖“神仙土”，对于工伤事故和犯人的死活是从不关心的。我亲身经历的这场塌方惨剧，虽时隔多年，当时的情景犹历历在目，心中犹有余悸，终生难忘。

天气很热了，时令已入盛夏。我所属的第一班调作第二班，即劳动时间调为子夜十二时至次日中午十二时。有一次上工不久，大约在凌晨二时左右，忽然刮起西北风，风势之大，实属少见，而且是凉风，这在夏季是反常现象。不久更变为冷风，吹得浑身发抖。夏天会刮起这样冷的风，我从未经历过。继而下暴雨，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声势吓人。岸上和河床两边斜坡上雨水倾泻下来，形成激流。由于大面积的雨水注入小面积的河底，河底积水迅速上涨。我起先躲在一个土墩上，拿箩筐盖着头，即通常意识中的避雨，等待雨停。可是雨势丝毫不减，一直在倾盆而下，不一会积水涨到了我腰际。我急了就从河坡往上爬，那知粘土淋了水非常滑，坡度又陡，爬了几步就滑下来，爬了上去，又跌入水中。那时水深已没腰。好在我会游泳，还不十分心慌，还能镇静一下头脑向四周观望，看到远处还有少数犯人像蚂蚁般地也在往上爬。但大多数人刚一下雨就走了，我因躲了一刻雨，走晚了。幸亏发现不远处的斜坡上有台阶，那里比光的斜坡好爬，但仍须用手指插入泥土

中才能爬得上去。到了河岸上心就定些，可是浑身是泥浆，只好任由雨水冲刷。那地带全是土路，经雨水浸淋后全成泥浆，走路很滑，十分吃力。我凭灯光认定了方向，往工棚走。走离工地后不远，因为没有了灯光，一片漆黑，看不出路，迷失了方向，雷声雨声又大，也听不到其他犯人的声息。空旷的峡谷中只我孑然一人，这时我可急了，恐怕走不回去冻死在外面。如果被认为是逃跑，那就有被枪毙的可能，这样的事例已经有过。正在为难时，忽然发现前面有一星灯光在闪动，我便鼓足勇气，死命地追那灯光，在黑暗中坎坷不平的泥路上，一脚高、一脚低地跑着，最后终于追上了。原来是一名电工，手里提着一盏马灯，他是来工地检修电线的，遇上了暴雨，也正在往队部走。他的住所离我住的工棚不远，于是我便随着他回到了工棚。小组的人全都回来了，我是最后一个。

这场暴雨下到天亮，接着是细雨绵绵一连几天。淮河和洪泽湖的水猛涨，淹没了还未完工的工地。工程无法再进行，只好停工。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暂时得到休息。大家把多日来穿脏了的衣服洗洗晒晒，我的衣服不多，也乘机机会清洗了一下，晾在工棚外面。不幸因为收得过晚，全部被人偷去，懊丧之极。天气正热没有更换的单衣裤，万不得已把被单改制成一套单衣裤。我从未干过缝纫，因此改制得很不像样，穿上看起来未免滑稽。好在处于那种场合下，没有人来注意一个人的衣着和外表，所以我穿上那套可笑单衣裤，也没有引起别人的注目或耻笑。

在这段时间，未完的任务不能进行了，以后的任务又还没布置好，因此暂时没有体力劳动任务。每天上下午各学习一次，内容无非是国内外形势，党和政府的政策，生活检讨会等。过度疲劳的身体得以逐渐恢复，但生活上却出现了极为困扰烦人的事。苍蝇和蚊虫之多，简直吓人。苍蝇在白天出动，蚊虫在夜里出动，于是大家称之为两班制，互相接替。白天吃饭时，吃窝头须先把它摇晃一下，然后立即送进口中，否则上面爬满了苍蝇，一下就咬，可能连苍蝇也吃进去。苍蝇如此之多，原因是犯人使用的茅坑，只是在警戒线内一块草地上挖了许多不很深的坑，使用一久，坑满外溢，遇雨即成一片粪海，从未有人去清理。于是大家各找隐蔽些的地方随地大小便，结果是墙角路边，工棚前后，树木四周，到

处是大小便，臭气熏人，令人作呕，给苍蝇繁殖提供了优越条件。夜里蚊虫嗡嗡声不绝于耳，被咬得浑身发痒。没有蚊帐，天气再热也必须用被子盖着身体，或用衣服蒙着脑袋，否则被咬得一刻也不能合眼。由于蚊虫肆虐，不少人患上疟疾，又得不到治疗，死人的事，时有所闻。我因抵抗力较强，幸免于难。

转移到苏北

大约过了十多天，一天早饭后，队部下达通知，叫犯人立刻整装待发，到哪里去不说，只说是去搞农业生产，劳动要比挖河轻得多，而且有菜园和田地，自己种菜种粮，生活也要好得多。到了那里可以说是安居乐业，并警告大家在旅途中要严守纪律，如果违法乱纪，企图逃跑，必予严惩。

平静了多日，一下子又紧张起来。至于打点行李倒并不费事，每人只有随身可带的应用物品，我的东西更少，不消半小时便整理好了，坐在阴凉处等待出发。以往在每次调动前，虽明知在旅途中要吃苦头，但因现实的处境太难熬，太折磨人，总以为换一个环境可能会好一些。这种心情，在犯人中普遍存在。过不多久，下令出发。大家排成四人纵队，步行离开原住处。

天虽放晴多日，但路上仍很泥泞，两脚粘上的泥巴很重，步履艰难。走不很远到了一个村子，穿过村子抵达一个河边码头。在那里有无数的民船靠在岸边，原来就是犯人要乘的船。船已编好号码，各小组都按分配好的船登船，秩序井然。太阳虽已偏西，但天色明朗，河岸两边有众多的武装人员在站岗，清晰可见，他们拿着上了刺刀的枪，如临大敌。此情此景使犯人心情沉重，默默无言。船舱很狭小，乘进了很多人，挤得连蹲都蹲不下，只好站着。就这样熬过了也不知多久，船停了。大家登岸后列队坐在地上吃晚饭，吃的是半干的馒头，又没有水喝，虽饿也难以入咽。

饭后列队出发，大家一夜站着挤在船舱中已疲乏之极，没有恢复就又步行赶路，再加

上背了背包，体力实在不支，走了约一个多小时后越走越慢。武装人员骑着马，背着枪，在队伍两旁奔驰，督促犯人快走，不时还用柳条抽打走得慢的人。由于体力差的渐渐落后，队伍越来越长，已不成队形，只是散乱地往前奔跑。最前的人与最后的人中间距离拉开得很大。我的体力属中等，又因背包不重，没有落到最后面的行列。可是心跳气喘，两腿酸软，也感难以支持。就在这时，听到后面有枪声，虽很稀疏，但连续不断，间隔有长有短，听来不是交火。同时手电筒的光柱在夜空中忽明忽灭，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说：“赶快跑，落在后面要被打死的。”

我大吃一惊，竟会有这种事？但夜黑如漆，什么也看不见，又加在慌乱中，也不去推敲这话是真是假，只顾加快步子，咬牙坚持。过不久东方发白，又死命挣扎了一个来小时，天色大亮，阳光灿烂。走在前面的人忽然停下，落后的逐渐跟了上来。队长们整理了队伍，并向大家宣布，目的地已到，即苏北滨海县劳改农场。从此又是另一番天地。■

【述 往】

我的自述

——十年苦难

王金锐

我更多的想记叙我自己：这个十七岁参加革命，十八岁入党，不能算上老同志，老革命，大家称之为“小王”，在这文革中，竟关押良乡监狱三年，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轰赶去外地农村七年。先是以上书写信给毛主席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监押多年；此“理由”不能成立了，又以我家的自住房产继承所有权上是我母亲写上了我的名字（是我七岁时写上的），竟又以“过剥削阶级生活”定为混入党和公安部门的“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公职，被轰赶到外地农村。

我过去也曾当过派出所所长、公安局分局科长、我曾召开“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训话会，也参与过对阶级敌人积极实行“无情专政”，一度也有一点小小不大的“手中权”的人，我自己也成了被“专政”的农村“地富反坏分子”，我也亲尝了刘传新列为“专政对象”、“敌我性矛盾”的感受与苦头。我的灾难，比那么多受大苦大难且受迫害比我时间更长的同志，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一个从十七岁就参加公安局工作，为保卫毛主席感到荣幸和无上光荣的我，且是忠心耿耿，积极卖力地执行者，我也成了专政的“敌人”、“异己分子”，也和“地富反坏”分子一起参加“训话会”“批斗会”，我也被剥夺了应有的公民权利和自由，这的确确是我一生所没料到的，也可以说做梦也没想过的，而毕竟是无情的事实。当我积极参与执行，把别人错划、错定、错管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时，我没想过由于错划错定给人一生和家庭带来的悲哀的痛苦，而文革中，“感谢”刘传新主任的“恩赐”，我自己也竟加入了被专政对象的行列，亲身尝到了其酸楚痛苦的滋味。佛经上是讲轮回与因果，或者说是报应，不谈佛学上的比喻，倒也可以说是小小的（比人家更大难的来相对说）无情的讽刺与嘲弄。因为，我确实也亲身尝到了左倾危害与被挨整，遭迫害的“甜头”（苦头当“甜头”说）了，十年人生最好的年华被埋葬了，当我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朝气蓬勃的中青年同志，赶上了三中全会召开，小平同志领导主持使党和国家改变面貌，带来好的机遇，奋发有为的为党工作，心中既高兴，又有些不平衡，怎么这不折腾的年月，不让我们这些人碰到呢？我们为什么非要赶上那一再斗，一再整，弄得人人自危，人心不安，鸡犬不宁的年月呢？这些只好化为心中的无奈，要不就是麻木，要不就是尽力忘去，求得“糊涂”，因为这苦难的岁月，埋怨谁去呢？埋怨历史吗？历史已随时间流逝；埋怨四人帮、康生、刘传新吗？即使“以牙还牙”“以怨还怨”，被整的苦难年月能让他们身受其罪吗，还得按政策办吧。埋怨长期形成的左倾错误和独断专横，不讲民主与法制吗？这也只能当作沉重的教训，可毕竟亲临其感受的人，内心的伤痕太深了。现在剩下的，只有看了戴煌同志著作后打碎了我麻木的心灵，激愤了我心头不得不想说出来的痛苦记忆，让更多的同

志懂得，让更多的年青同志知道，这样颠倒黑白的悲剧与残酷的悲哀不应在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再重复，再上演！

一. “冒死上书”给毛主席写信

文革初期，我还能做些工作，公安部派来了夺权工作组，我们不大被重用，因是局长身边的“秀才”，得写揭批材料，也一度参与值班、编简报等工作，在红卫兵上街破“四旧”，社会治安很乱，也曾派去抓抓情况，回来写写材料等。到等刘传新为首的军代表来了，就逐渐靠边站，强命写揭批材料，有时也挨批判了。

我得如实说，我也写过不少上纲上线的揭批材料，也揭发批判冯邢等“反党罪行”，也激动呐喊“打倒某某领导的”口号。但我自己，早在参加宣武广内街道搞四清，跟随邢相生局长蹲点搞街道四清，文革开始就被戴上“高帽子”，挂着“大牌子”，以“黑秀才”，跟随着几位领导上街带着“吊死鬼”样高帽子游行，绕着街道礼堂会场转圈挨批斗了。

本来我如果“老实一些”，就这么着狠批别人，也狠批自己，随着大流，也许我后来不会受那么大的罪，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有人称我是“又跳又闹”，“态度很坏”。这也是事实，不用掩饰。

那时我没有什么超人的高觉悟，我更不敢怀疑“文革”的四人帮、当时的“领导”，更不用说我去怀疑反对毛主席，至今，砸碎我骨头，我也敢说没有。我表面上揭批，但思想上确实有些想不通，怎么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好多领导，都一心想的是保卫毛主席，刘传新已定了调子冯邢是“勾结敌特”的“大特务集团”了，我们已成为“集团”的“黑骨干”了，几位局长也开大会抓起来了，那时写揭批材料已大大超边了，什么“走资派”“修正主义”，在刘传新眼里早已通不过了，在当时，我作为跟随去调研的“知情人”，写一般的，甚至词句严厉的揭批材料，已不成，非要揭批交代写出冯邢等是“在大兴等北京周围，阴谋积蓄反革命力量”，甚至军代表已提出“是冯邢等大特务，配合贺龙等妄图

反革命政变”“反对、陷害毛主席”等，这不是太超边了吗？我们这些人怎么“知情”，也不能“知情”写出我们要搞“反革命政变”呀！尽管我也狠揭猛批，痛斥罪恶，但内心也却有想不通。我那时天真地想，毛主席他老人家不会这么看，直到文革结束，我离开公安局，曾熟悉的公安朋友告诉我，毛主席确实是不相信，且让周总理转达他不相信北京公安局有那么多叛徒、特务，“如果真是这样，我还能安全坐在北京的中南海吗？”，大意是如此，我是文革后听公安老同志告诉我才知道的。可刘传新竟敢封锁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对抗周总理转达后希望大批老公安干部尽快解放出来抓工作的指示。刘贼坚决按照四人帮、康生、谢富治的黑指示办。

我当时不可能听到毛主席的声音，我只想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按党章规定，我有权利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反映我的想法和要求。这个权利，我认为谁也不能随便剥夺的。我没有恶意，也无权评写对文革看法，也没那么高觉悟，我想向毛主席反映北京公安局一个单位的情况与要求，是应该可以的。我在家里，几天夜里没睡，怀着激动心情，工工整整地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封面上写着：“送请中央办公厅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信的底稿，都被抄走了，至今也没有归还，我向公安局组织要了好几次，也无下文，听说连同文革的废档案也不好查了，我也只好不追究了。如果还保存，我希望归还，落实政策，交给我本人，这是我一个共产党员和公民应有的权利。

信是我自己写的，如果有缺点或错误可以接受批评，应是合法允许的。我清楚记得，我向毛主席反映，公安局工作有错误，应批判，但好几位局长抓起来定为“大特务集团”，我想不通，也说了局里处长科长多数是好的，不应都打倒，应给我们点工作。也还说了点关于街上红卫兵的事。大意如此，标题我写了“冒死上书”，我决不是反对毛主席，只是想表示一下我个人的勇气和决心，即有死的风险我也不怕。我现在要说，既使我写信有什么错误，我并没有涉及党，也没有涉及国家，反映一下单位的情况，都不可以吗？

我堂堂正正署名“王金锐”，亲自送到中南海西门，送给接待信访的同志。过了几天，我又去打听，他们查了一下，一位同志对我说，汪东兴同志（他当时任办公厅主任）让转

给公安部谢富治部长了。毛主席那么忙，不可能看到，我不能说什么，我又去公安部上访，接待同志给办公厅问了一下，说谢“部长”已转交给北京公安军管会刘传新“主任”处理了，你去找公安局。这时，我才知道“大事不好”，按俗话说“撞到枪口上了”。

我当时也还天真的想，也许“刘主任”找人与我谈谈，严厉批评一下就完了，其实那有那么便宜的事。政治斗争是残酷无情的，共产党员给自己的领袖和党中央写封署名信，也竟成了“大祸”。

几天后，在单位军代表授意下，造反派就连夜去查抄我的家，翻桌倒柜，连我信的底稿，和工作中照的照片，甚至结婚个人像片都抄走了，至今信底稿和一些照片也未归还，找谁问也没下文了。

又没几天，借口我写一张批判大字报标题连接有“错”，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在一天下午大哄大喊，揪着头发，倒拧着双臂从办公室给揪送到公安局大操场，当着众多的人批斗。几天之内，满院之内多是我的大字报，什么“冒死上书，恶毒攻击毛主席”“替冯邢大特务集团鸣冤叫屈，妄图翻案”，我是冯邢“特务”的“孝子贤孙”、“黑爪牙”、“黑干将”。在操场上，让我低头站在中间，周围狂喊：“打倒现行反革命”，有人动手打，打得头出血，还有人猛用脚踹我，将我踹爬下，还不放手，甚至踩肚子，有人竟说：“将他打翻在地，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而“支左”的军代表就在一旁冷冷看着，任人所为。当捆拧着，我流着血，押送回来的时候，一位熟识的也曾一起工作，也去抄家抄信的造反派小头头，讽刺我说：“谁叫你没事撑的给毛主席写‘反动信’，你，有人打你也应该，那是热爱忠于毛主席，你要正确对待！”一个军代表阴阳怪气地说：“你要老老实实交代写‘反动信’的动机和目的，还有什么主谋人，你与黑帮有什么联系？”

这就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应讲法制的公安局，光天化日之下众人共睹之事。这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所谓的“文明”！不然，怎么会称之为“文化大革命”！我们中国文明悠久的历史，就是用这样的野蛮“行动”解释吗？！

是的，我现在要大声说，大声喊，一定要正确对待。这个正确对待，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也应包括一个公民给自己的领袖，党和国家领导人，给党中央写信的权力，反映申诉的权利，什么时候都应当受到党章和宪法的保护！什么时候，也不应剥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的党，就不能称其为伟大的共产党了。这个，从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议上写万言书遭批判为先例，以至上行下效，到文革，被四人帮歪曲，越演越烈，以至刘传新等竟敢派人查抄扣信，甚至恶毒动手当着军代表打人，可以说是无法无天的恶剧、悲剧，决不能再发生，再重演了！

文革结束后，我在外单位，公安局在清查中有个同志去找我外调，让我写写去抄家又动手打我的那个人的材料。我表示拒绝，没有写。我说怎么处理是你们组织的事，我不写材料，我说，“动手打了我，踢了我算什么，如果没有那个运动，都是一起工作的同志和朋友，他怎么会动手打我？我现在怨恨他，他又该去怨谁去？”在那个本不应该发生那么严重长达十年的悲苦剧，不从根源上去找，从制度上去保障和纠正，光计较彼此间的恩恩怨怨有什么用？当然，对少数别有用心整人害人，坏事做尽做绝的人，决不能放过，也决不能让这样还有漏掉的再图谋掌权上台，我们的党和人民要百倍地提高警惕！

二. 失去了自由

从以“现行反革命”在公安局大院里揪斗毒打，家也被查抄，给毛主席写信的底稿也成为“罪证”被抄走至今无下文，从这时起，我就关押在局里地下室，不许出门，不许回家，后又转押到良乡监狱（名为看守所），有五、六年多的时间与外界隔绝。我这从十七岁就参加公安工作的干部，反右斗争时也曾积极过的我，也被打入了冷宫，列为了“另册”，我也尝了失去人身自由的滋味，与说不出的酸痛。

什么事，都得亲临其境，自己去吃吃梨子体验一下滋味。我赞同北大季羨林老教授用血和泪写的最近出版的《牛棚杂忆》里说的，请那些当时积极整人，残酷逼斗折磨人的造

反派、军代表，也应当反思一下你们为什么要那么折磨人的心理与心情。尽管不能怪你们，你们也是执行者，刘传新这样是少数，但也请你们晚年共同反思一下你们当时折磨人的做法也太过头了，如你们身临其境也感受体验一下，也许你们内心也应该有些歉意与不安，让我们共同吸取那灾难悲剧的教训吧！不是真正少数触及王法，经严格批准程序的，是不能随意整人，以此对待自己的干部和同志。

体验最深的是人世间之冷漠，世态炎凉，人情如纸薄，谁也不敢理你，也想法躲着你，这在当时也是可以理解的。

操场上斗打完，用脚踢的腰部肿疼，嘴角打的流血，只有自己擦擦揉揉，从此，就睡在地下室一间屋子冰凉的木板床上。早晨，迎着星星就起床，打扫楼道，厕所。吃饭时，有人跟随，吃完饭赶紧躲回黑屋。外面的消息，家里一家老小的情况，就一点也不知道，也无人告诉。最难过的是节假日了。别人几人一桌，举杯欢笑，我这样的，还有别的被揪出来的难友，相视看看，不敢言语，赶紧买几个饺子，就躲到屋里。揪出来不准回家的第一个除夕夜，我的心情还没转过来，磨练的还不够水平，面对空荡荡的食堂大厅，我打完饭躲到屋内，听着窗外的鞭炮声，闪过的礼花，我一个人能不想想家中的老人和孩子吗？红卫兵上家查抄即被打后病死的父亲，尸首曾停在院里的砖地上，我连一面都没去见过，生怕说“划不清界限”。我那近八十岁的母亲，她只有我一个儿子，从小到大最疼爱的是我，也从没离开过我，我这突来的遭难，连三十晚上也不能回去，她能接受的了吗？我的爱人也是公安干部，在同一大门内上班，我在局内遭斗打，全是“反革命”大字报，她全看着，为我的事牵连她，也遭人歧视，她一人带着两个女孩，一个八岁，一个六岁，她还怀着孕，快要临产，后来知道生了一个女孩，可有六年的时间，我没有见过这个女儿。在人人举杯，家家欢乐的除夕夜，爱人和那几个不懂事的女孩子，见不到自己的爸爸。还有岳父母两位老人，我从结婚时起就跟着我一起过。岳母知道给我，包我爱吃的白菜心馅肉饺子，每年三十她都包完，我工作多晚也等我回来。现在他们重病在床，这一家人的心情是什么滋味？能够做到“心情舒畅”，能欢快起来吗？可在当时，在刘传新这伙人的眼里，

这样做天经地义，什么亲情，人世间最起码的团聚和感情都给剥夺了，他们连一点节日小小的宽恕，使一家老小见上一面都不给。

我独自一人，吃着冰冷的饺子，顿感迷惑和人生的茫然。我一个十七岁就出来跟党走的人，到底犯了什么王法和罪过，竟遭如此的对待，我内心里确实想不通，眼泪独自一个人流。自己只能忍受煎熬。大年初一早上，我就又起床，去打扫厕所和空荡荡的楼道，干完活，又像鬼魂似的悄悄不敢看人也不敢向熟识同志道一声“春节好”，躲到那阴冷潮湿的地下室的黑屋，天，能够亮吗？我顿感迷茫。

有一次，家里想念我，怕我吃不饱，我母亲让我爱人给我送来两个面包，几个香蕉，和几个煮鸡蛋，交给了单位审查和看管我的人，他们收下了，可第二天就把这提兜吃的挂在操场旁走廊上，贴出了大字报，称“资产阶级好逸恶劳遗毒没有变”，我又挨了批斗，有人讽刺说：“你还竟敢吃香蕉？”“够胆”，爱人在单位也为“划不清界限”遭批判，也就是说在那样的年月，我便秘便血，想吃几个香蕉的资格都没有，这是对人，对同志的感情吗？

在非法关押的初期，我实在适应不了这不自在的生活，鸟都向往飞翔，何况活生生的人，有感情生活的人，我思念着母亲、爱人和孩子。一天夜晚，我趁着看守我的人睡着了，即偷着从公安局大门跑出，夜快十二点，跑回我家，见到快临产的妻子和一个八岁一个六岁的女儿。我那八岁的女儿，从小心灵就受到这不应该受到的打击创伤，她不明白，春节别的孩子有爸爸跟着玩，自己的爸爸怎么不叫回来？但她有了孩子很少有的沉默，她常瞪着眼睛看着，但不说话，。八岁的孩子，带着六岁的妹妹，妈妈不久又下放郊区劳动，奶奶后又去了四川，姥姥犯哮喘卧床，她学会生火炉子，上街买菜，给姥姥熬汤药，后来，姥姥、姥爷都离开了人世，有一位好心的大娘照看一下，晚上还得回家，她一个人带着妹妹睡，生怕睡滚到床下，就在床上堵个枕头，翻身有枕头挡着不至摔了。刮风下雪，寒冷之夜，她得起来给妹妹盖上被子。请问，这样的家我不应当回去看一看吗？我去看一看病重老人和孩子也算是“翻案复辟”也是反对毛主席吗？这样的感情都给剥夺这还叫讲理吗？

可是在当时，这竟是弥天大罪。

我偷着回了家，爱人既想我又紧张，叫我赶紧回去。我抚摸了两个睡着又醒来的孩子，孩子紧拉着我的手喊“爸爸，我们想你”，我又问了老人们病情，年近八十岁的母亲嘱托我说：“孩子你得保重自己，我死了合不上眼，唯一不放心惦念的就是你”，我安慰了老人，又赶紧离开家。面对午夜刺骨的寒风，和星光闪耀的夜空，我心中无名之火升起，我想这叫什么世道？怎么对待自己的同志可以这样为所欲为？我要去中南海讲讲理，我的心又天真地冲动了，我穿了两只棉破布鞋，一只鞋破，脚底磨出血，走了近半个城，到中南海西门，警卫很远即高喊：“深更半夜，你来干什么事”，我说：“我要见毛主席反映要求”，警卫怒斥说：“毛主席是伟大领袖，你这样的人能见到吗？简直冲昏了头，赶紧离开。”这时我的心才凉了，真是白日做梦，就赶紧又跑回局里。这时，看管我的人已从家里叫醒家人，翻查了一通，也回来，第二天我又以“私自外逃”，“对抗，不老实”批斗了几次。从此，我也打消了想回家看看的念头，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也没有可私下逃跑的，这样，我就逐渐习惯适应监押失去自由的生活，且失去人身自由长达几年。

三. 父亲被红卫兵毒打而死

我父亲王楚卿是从河北静海县农村来京，在段祺瑞府当马夫喂马，他会些毛笔字与珠算，也有点文化，爱存古书与字画，逐渐受重用，当了段祺瑞府看宅门的“总管”。日伪蒋伪时在家，靠几处置买的房产出租维生。解放后政府允许他出租房屋。他与我母亲和我一起生活，但他总说共产党比军阀好，社会不像军阀混时期那么乱了。政府聘他为区政协常委，担任几年，他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抗美援朝买飞机带头参与，卖自己东西捐款，受过表扬。全国政协派人记录下了至今保存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上他陈述的段祺瑞府的见闻记忆文章，一度聘他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这样的人能说他反对共产党吗？可就在文革初期，红卫兵上街破四旧，把这个仍是原政协常委的七十多岁老人，罚跪在院里砖地上，

打得浑身血伤，房子没收充公，家中东西连他保存好多名人字画古董整车地抄走了，他保存多年古本木匣精装的二十四史，列为“封资修归公”，一本没剩都抄走了。段祺瑞给他写的“四季平安”在屋内用玻璃裱封的匾，更是“反革命罪证”，让红卫兵给砸碎了。至今，我听说二十四史，还要印出，文化名人或老领导家中房内堂堂正正摆着，也看到报上介绍毛主席也爱看古书，还曾在二十四史上评注过，我最初还有点惊奇，还不敢信，但，这确实是现在也刊印出的版本，我自己没钱买不起，我有时内心又想，怎么当时二十四史，必定是“封资修”，怎么我们家我父亲保存那么多古版本，竟可以被抄走，至今一本也没有归还，连一卷字画也没有还，这该找着谁说理去呢？也许像我爸爸那样的人，就不应该看、买、存二十四史，是他自己活该吧！前几天我看到大的拍卖会上，竟列举吴佩孚的、段祺瑞的条幅，都可以拍卖，且争相投价，我更感到不明白也感到可笑了，我们家的段祺瑞写的“四季平安”看来这不能算“反动”话，怎么就可以砸烂？挨斗，红卫兵打他还不算，竟让这七十多岁，有病，从小就离农村来北京生活几十年的老人，强令几天，轰出北京，不去，红卫兵的鞭子就得抽！他这么个老人，还有个六十多岁的照顾他的姨母，两个老人又病又冷又饿，被轰回上千里地的老家，靠沧州的静海县。他挤不上火车，实在走不动了，无奈回来躲在一间破旧小房住下。听说有人表示了同情，一个月给他们两个老人“二十元”生活费，我父亲不久病重死去了，那位姨母不久也死了。他们一座精致的四合院，听说做了好多工作，交公后给折了几万元；又听说，在拆迁扩建平安大街道路工程时，报上还拍了像，介绍那个精雕细刻有优美造型人物的砖瓦门楼，作为文物保存到公家那里，作为精美“保留”较好四合院的一个见证。我从参加公安工作后，文革前就与他划清了“敌我界限”，参加公安工作审查历史是很严的，我早就交代他是个“剥削阶级分子”，是给段祺瑞家当差，当总管，封他“文承宣官”，接待门房与客人的“职”。我不与他住在一起，也不给他生活费用钱，也尽量忘去小时候他拉着我的手，年三十去热闹的东四牌楼，给我买爆竹，买糖葫芦，临节前带着我到东四六条松竹园澡堂，冒着热汗给我搓身上的泥，因为这些怀恋，就已可算为“资产阶级的温情的腐朽意识”。参加工作后，他有时高兴地

对我说他又当选为区政协常委了，又听区长报告了，说党和政府好。我有时仍严肃的对他说：“你必须好好改造自己的旧意识”，“正确对待你在段祺瑞府里干的事，向人民反省”。他有时不言语。又一次他说段祺瑞是挺坏，军阀，但他也曾不主张袁世凯当皇帝，为此曾一度辞去职务，连鼻子也曾气歪了，我交政协回忆材料也如实写了。我当时听了更火，就严厉批评说他：“必须好好改造”。他知道我是干公安的，又是也不敢言语，与我母亲一起吃顿饭，就赶紧又走了。刚进城时的老分局长都知道，有的也见过他，介绍我入党的老同志还劝过我，说经过审查，他日伪蒋伪不当汉奸，不给国民党干事，靠几间房子出租生活且当了区政协委员、常委，这相当不错了，不要不管他，更不要不理他，他毕竟是你生身之父，即使你入了党也不能这么划清对待。这是从延安老区来搞人事老同志对我讲的，我想老同志说的对的，但还是保持点距离算表现好。

到了“文革”，我更得与他划清阶级界限，更不敢看他，红卫兵抄他，斗他，轰他走，他身上有伤，病重而死，也只是孤伶伶的一个人，听说我大姐曾经自己去做苦工挣点钱，补他生活。直到他死我也没有与他见过面，未曾掉过一滴眼泪，我自认为自己够坚定，分清敌我的了吧？可那时的军代表造反派也不放过我，我照样得写检查，挨批评，还称我给毛主席写信是“剥削阶级的内心不满”，是替他那任过军阀时“伪职”又剥削收房租，仍“留恋效忠”，“妄想让冯邢大特务集团将这样反动分子的儿子混入公安和党内”，“王金锐为剥削阶级鸣冤叫屈”“妄想借尸还魂”。这等于我怎么划清界限，也没有用。现在当我看到书架上，竟还有出版介绍张之洞、吴佩孚、冯玉祥等传记的，还有介绍袁世凯、段祺瑞的，我至今一本没有买过，也拒绝看这介绍，可有时又想连慈禧还称她为“皇太后”，翻来覆去的在电视上演，我心里也不平衡。什么冯国璋、吴佩孚、张作霖、段祺瑞，虽各有各的“罪”，但不也可如实的按当时那个年代介绍评价一下吗？政协文史资料上已刊登了不少，可我那个至少给段祺瑞做个小小的“官”，似乎不应当算大罪恶，也不应当那么查抄，没收，轰赶，殴打，竟孤惨的一个人死去，连自己从小疼爱的儿子都不敢去看一眼。有时我夜里睡不着，从抽屉里拿出私自保存未被抄走的我父亲那张慈祥含笑的照片，我又

止不住地流泪，深感我这个不孝逆子，几十年来，从文革前那样冷酷对他，使他这么个老人从未感受父子亲情的温暖，死时冷躺在硬木板上的一个人，我连去看他一眼向他告别一下的勇气都没有，内心又充满痛苦酸楚的内疚和深深地愧疚。我又想起进城时介绍我入党的老局长说过的，不能这么样的划清，他毕竟是生养你成人的父亲啊！我深感良心的自责与忏悔！这样当时被打倒，甚至被打死的，列为“反动”的众多小人物，过去谁敢给他们说一句公道话，只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有胡耀邦同志的主持，公安部门才将一大批“地富反坏”分子摘了帽子。我父亲还不算这类，但也是在段府当差，享受过剥削生活的房产主，这样的人也为数不少，且像我父亲这样小小的政协委员，不算名人，谁又想着给这样的人开个追悼会，或宣布一下平反？我曾向一位了解我父亲，主管区政协秘书长的朋友说过，他说：“我们也怀念你父亲那样的老人，他也出过力，为街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也只能是个人的怀念”。当时这样不公正对待的老人多了，也解决不过来了，象征性的给点钱，给几件东西，好多物品是查不到了，也没法落实了，至于像康生那样组织红卫兵查抄的名人存的好古玩，好字画，好墨砚，也一度据为己有。文革结束，有些按政策归还了，不少的也找不到了，向哪里去查问也没有用。我父亲的好多字画，我不敢去问，他的亲人去问，答复是找不到，劝说也是“对当时的红卫兵运动，要正确理解，不要过多纠缠计较了”。是的，的确不应当计较了，至今我的家里连张名贵的字画和一件古董古玩也没有，我只能看到拍卖市场消息的介绍和介绍别人对文物鉴赏。我不去参加，也不去求索一张名画。但如果我要反问一句，凭什么康生、张春桥他们竟敢借红卫兵查抄将人家存的文物收为己有，这当时也是封资修，是谁允许他们这样做的？且采用雍正时沿用的满门查抄，是曹雪芹都内心不平写了伤感凄情的《红楼梦》，竟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所谓红八月在全国铺展，查抄，轰赶，甚至涉及九族，人数之多，株连之广，可以说超过那个封建皇朝年代，为什么？谁允许当时可以这么胡作非为，且光天化日之下堂堂正正去做，连公安局都可以不经法律批准去查抄人家，为什么在宪法已规定后，六十年代还能允许发生？这能是一句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就解释过去的吗？红卫兵小将不懂事，凭一时热情与激动，也可

以谅解，但在祖国首都，竟可以越演越烈，敬爱的周总理只能保护少量的名人，更多的数不清，也照顾不了，当时身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等，纵然不管，实际支持胡作非为，这样深刻的悲剧，不应该好好去反思，去探讨一下成因与吸取教训吗？

我现在已不计较我父亲这样的小人物应不应那样查抄、斗打后病死，应不应该去平反了，也不想要那不曾归还的文物珍品了；这些在正确的政策下，能解决一些就已不错了；而且我自己，就不曾正确对待自己的亲生父亲。我自己就为了保住自己工作和阶级立场与他划清界限，还有什么资格和权利去怪别人呢！我只能向父亲的亡灵说：请您原谅我这不孝的儿子，也请您谅解在您晚年本可以安详度过，但没想到发生了那样不该发生的悲剧吧！我们的党、小平、耀邦主持正义的领导，毕竟把那场悲剧纠正过来了；九泉之下，请您谅解我当时也有难言的苦衷；现在我也老了，我向您说一声对不起您，请您原谅我吧！我现在的心情也很沉痛，有着难言的自我折磨！

年轻的朋友们，请你们别像我，阶级观念，敌我界限，我想还是应该有的。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生身父亲要尽孝还是不应该随便丢弃的啊！不要像我，赶上那年月，我为了保住自己的小职位，表现自己坚强，与父亲剥削行为作斗争，竟不理他，死了也不敢去看他，写检查时我还写我与反动父亲坚决“划清界限”，他“自取灭亡”。我要“坚决”划清界限，斗争到底！没想到，我这么样地对待我父亲，我还是难逃劫难，自己也成了“反革命”分子，“剥削阶级敌对分子”，比我父亲遭受更大的罪，这也许是像佛家说的轮回报应，和上天对我的惩罚吧！现在我自己也老了，后悔也晚了。

年轻的朋友，无论如何要孝待自己的父母啊！■

选自《王金锐回忆录》第五章 自印书 2015年

【资 料】

北京市革委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1967. 04. 21)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斗争、大批判中，我们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告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这是您的光辉思想的又一支响彻云霄的凯歌！这是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在这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盛大的节日里，我们欢呼，我们歌唱，千万颗红心迸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啊，毛主席！当我们回顾我国革命的光辉历程的时候，千言万语倾诉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忠诚，千歌万曲表达不出我们对您的热情歌颂，浩荡的大海容纳不下我们对您的无限崇敬和无限热爱。

是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缔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是您点燃了井冈山上的星星之火，开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航程；

是您指挥中国工农红军跨过万水千山，实现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是您在永垂史册的遵义会议上，结束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奠定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基础；

是您在革命圣地延安，指引着抗日战争前进的方向；

是您统帅浩浩荡荡的人民军队开进北京，为古老的都城带来了春天；

是您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缔造了伟大的人民共和国。

在那漫长的战斗岁月里，在那波澜壮阔的革命征途中，您带领我们战胜了一个个的艰难险阻，闯过了一道道的惊涛骇浪，使灾难深重的祖国从黑暗走向光明，象巨人一样地出现在世界的东方，给世界人民带来了胜利的希望，象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照亮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道路。

毛主席啊，毛主席！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您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率领我们开始了新的长征。

是您揭开了旧北京市委、市人委的黑幕，粉碎了隐藏在那里的一小撮野心家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

是您亲自决定广播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是您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拨正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航向；

是您英明地发现和热情地支持了威震世界的红卫兵运动，在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红卫兵小将们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建了不朽的功勋；

是您在北京检阅了来自祖国五湖四海一千多万文化革命大军，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

是您在北京发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进军令，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是您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总攻击，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伟大战役的进军号。

这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这一幅幅惊心动魄的雄图，描绘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灿烂前景，谱写出您的光辉思想的颂歌，书写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雄壮的篇章，开创着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旧北京市委、市人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支持、包庇下，把北京市搞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妄图把北京变成在我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基地。十几年来，他们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目睹他们的滔天罪行，我们怎么能不愤怒？！怎么能不造反？！怎么能不夺权？！我们怀着誓死保卫您，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决心，凝集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向旧北京市委、市人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发动了猛烈攻势。当我们刚刚打出第一发炮弹的时候，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在我们伟大的首都扼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了捍卫您的光辉思想，为了捍卫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造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揭出这条反动路线的炮制者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冲破了重重阻力，扫清了层层障碍，斩钉截铁，下定决心：坚决把旧北京市委、市人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打倒！坚决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彻底的批判，把他扔到历史垃圾堆！我们决心把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同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市人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结合起来，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斩断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伸向各个领域的黑手！

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心不死，妄图翻案；他们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进行反攻倒算，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他们的总后台，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要牢记您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高举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总攻击，把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他精心炮制的大毒草《修养》批倒，批垮，批臭，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垮、斗臭，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坚决完成您交给我们的斗、二批、三改的伟大历史使命，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敬爱的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是您提出来的伟大方针，我们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我们一定要把革命放在首位，以革命统帅生产，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掀起一个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高潮，誓夺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坚决执行和捍卫您提出来的革命的“三结合”方针。我们要在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战斗，在彻底批判他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我们要坚决粉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伪装“革命”，妄图钻进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搞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我们一定要夺好权，掌好权，用好权。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决战的关键时刻，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战斗号召。这是您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人民解放军是您亲手缔造的、林彪同志直接领导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们要坚决粉碎阶级敌人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阴谋。我们一定要好好向解放军学习，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活动，把人民的首都建设得象磐石一样的牢固，象钢铁一样的坚强。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我们的最高统帅，您是我们最英明的舵手，我们永远跟着您闹革命，永远跟着您在大风大浪里奋勇前进！谁敢反对您，谁敢诋毁您的光辉思想，谁敢对抗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就造他的反，就把他打倒，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宣誓：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我们一定要把“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等光辉著作当作座右铭来学，在灵魂深处开展破“私”立“公”的大革命，大夺头脑中“私”字的权。我们一定遵循您的教导，边战斗，边整风。我们要大反无政府主义，彻底克服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念，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

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新秩序，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把我们的队伍建设成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队伍。

北京是伟大祖国的首都，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希望和灯塔。在您的英明领导下，我们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信心百倍，斗志昂扬，一定要把北京建设成永远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最红最红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城市，建设成世界上反帝反修的社会主义红色堡垒。

最最衷心地祝愿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

【资 料】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1967. 08. 13)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青海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告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在您的光辉思想照耀下，在革命的大批判的高潮中，我们青海省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以“八·一八”革命造反派为主体，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把青海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据的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了！都夺回来了！

这是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乘风破浪胜利前进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西北高原的一次大捷！

凯歌高奏，红旗漫卷，在这欢庆胜利的盛大节日里，我们欢呼，我们跳跃，我们热血沸腾！千言万语涌心头，心潮逐浪热泪流，我们一千遍，一万遍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主席啊，毛主席！今天，当我们回顾一年来青海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时，我们的眼里饱含着激动的泪水，心头充满了对您的无限热爱。昆仑山高，您光辉的形象更比昆仑山高，青海湖深，您天大的恩情更比青海湖深。以祁连森林作笔，用青海湖水当墨，也写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感激，无限敬仰！我们永远永远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那掌握着中国革命航船之舵的巨手，引导我们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以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亲手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是您亲手书写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光辉的篇章，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问题，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和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

是您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

是您亲自决定广播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是您高瞻远瞩，以极大的魄力，果断的措施，亲手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宣告了维护旧世界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

是您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进一步系统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照亮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前进的道路。

云涌星驰宇宙宽，风吼雷鸣气势豪。毛主席啊，毛主席！您一系列的伟大指示和英明决策，鼓舞着亿万文化革命大军，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了全面的胜利的总攻击。

敬爱的毛主席，您老人家一声令下，我们挥戈杀向战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您伟大的号召，给了我们必胜的坚定信念，鼓舞着我们向青海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连续冲击，清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顽固堡垒。

造反有理，一反到底。您殷切的期望，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勇气和力量，使我们在1966年6月3日的《青海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的社论，决心紧紧跟着您老人家，誓当砸烂旧世界的闯将，永作开创新时代的先锋。

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一年来，我们迎逆风，战恶浪，冲破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围困。

“一二·九”在民和，我们粉碎了旧青海省委妄图私自销毁一汽车黑材料的阴谋，“造反有理”的战旗在湟水两岸高高飘扬；“一·二八”大夺权！我们踏着“一月革命风暴”的狂涛怒澜顶风上，击退了资产阶级经济主义歪风的进袭，我们革命造反的红色铁流浩浩荡荡。是您的革命路线时时为我们胜利领航，使我们在斗争的暴风雨中锻炼成长。

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您老人家为人类命运操劳，语重心长，我们为祖国前途出力，志大胆壮。您光辉的思想是我们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精神武装。“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急流险滩无所惧，刀山火海我敢闯。我们彻底粉碎了青海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反革命复辟逆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您的革命路线，保卫了您光焰无际的伟大思想。

“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毛主席啊，毛主席！在阴云迷雾的白色恐怖中，我们日日夜夜仰望着您光辉的形象；在艰难的日子里，您老人家的教导深深铭刻在我们的心坎上！

浩歌正气动天地，生生死死为革命。面对残酷的迫害，我们高声朗读着您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英勇守卫青海日报社的九天九夜里，我们满含热泪无限深情地一遍又一遍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我们高举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面向着东方，心向着东方，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碧血青史写新篇，蓝天白云寄红心。

旭日东升照长空，锦绣河山展新容。毛主席啊，毛主席！又是您老人家洞察一切，及时发现了青海的问题，拨正了青海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航向，引导着我们走上了新的历史航程。

天大地大不如您老人家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您老人家亲！我们又怎能不千遍万遍地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在您光焰无际的思想照耀下，历史的长河更加汹涌澎湃，波澜壮阔，浩荡东向，气象万千。今天，青海的形势大好！您的革命批判的大旗，插遍了昆仑南北，您播下的革命种子，生根开花在湟河两岸，一个万炮齐轰中国赫鲁晓夫的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正在青海高原全面兴起，蓬勃发展。

革命实践使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了您所教导的真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的现实，使我们深深懂得：政权就是我们的命根子。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们一定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誓死斗争。我们决心遵循您老人家的教导，高举您的革命批判的大旗，把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同批判他在青海省党内的代理人结合起来，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坚决完成您交给我们的斗、二批、三改的光荣任务，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使祖国的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敬爱的毛主席，您给我们撑腰，我们要为您争气。我们用鲜血和生命从阶级敌人手里夺得了大权，我们也一定要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这个大权。“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

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有您光辉思想的照耀，有您亲自主持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我们敢于为无产阶级掌权，我们也一定善于为无产阶级用权。我们坚决执行和捍卫您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方针，加强青海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为迅速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秩序而斗争。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深深地懂得，我们的胜利同您的战略部署要求比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一定念念不忘您的告诫，要警惕“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遵照您所提出的“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牢记您“既当‘官’，又当老百姓”的教导，响应您“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的号召，警惕阶级敌人“和平演变”的阴谋，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作风，永远永远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色，永不变质，永远革命。

敬爱的毛主席，您总是谆谆教导我们：必须实行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我们一定听您的话，照您制定的政策办事，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总攻击。我们不但要做国内革命派，还要做世界革命派，永远不忘国际上一切受压迫的阶级兄弟，随时准备支援亚非拉地区反帝反修的斗争，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普照全球，闪耀万代！

敬爱的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是您提出来的伟大方针，我们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我们要乘文化大革命的东风，猛促工农牧业生产，多快好省地为把青海建设成为祖国社会主义的战略后方而挥汗劳动。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战斗号召。这是您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青海的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和“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肩并肩，心贴心，急革命派之所急，帮革命派之所需。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

谁能敌？我们要永远向解放军学习，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活动。誓让莽莽昆仑变为钢铁般的长城，绵绵祁连变成无敌的防线。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我们的英明舵手，您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我们誓死保卫您，誓死保卫您的革命路线，保卫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永远永远牢记您的教导：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我们要高度警惕那些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千秋万代忠于您的思想。谁敢反对您，我们就打倒谁！谁敢诋毁您的光辉思想，我们就造他的反！谁敢动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根毫毛，我们就砸它个稀巴烂。为了保卫您，我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江山代代赤胆在，长河滔滔志不摧。我们忠于您的红心永不变，您伟大的思想永远永远与日月同辉！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庄严宣誓：我们最最坚决地执行林彪副统帅的号召，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我们一定要用您光辉的思想，来统帅一切，推动一切，改造一切。我们要把学习您的光辉著作，看得高于一切，先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我们要永远以“老三篇”为座右铭，在改造世界观上狠下功夫，彻底斗倒“私”字，在头脑里树立您光辉思想的绝对权威，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誓把青海建设成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让伟大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永远永远照耀着青海高原。

毛主席啊，毛主席！千言万语说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有了您，人类的命运就有希望；有了您，世界的前途就有指靠；有了您，我们就有光辉灿烂的未来！我们要永远紧跟着您，紧跟您的光辉思想，紧跟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以您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时代在前进！祖国在前进！请您老人家放

心吧！我们决不辜负您的期待！千年青史，在您的教导下，由我们来谱写——谱写成您光辉思想的颂歌；万里山河，在您的指示下，由我们来安排——安排成您光辉思想的新天下！我们永远永远是忠于您的新一代！

最最衷心地祝愿您啊，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

【读者来信】

1. 王复兴更正声明

《记忆》编辑部：

《记忆》第147期刊发的本人《北大工军宣队领导下的清理阶级队伍——翦伯赞是怎样自杀的》一文，二处有误，需纠正。在最后一个自然段中有二处要更正：一是“在8月18日下午的最后审问中”，应是12月，误写为8月。二是在括号内的二行文字“当年国共谈判期间……曾养甫派出的。”其中“谌小岑”这姓名有误且全句意思不对，括号内全句改为“当年国共谈判期间，翦与一女子发生了不正当男女关系，此女子在五十年代肃反期间向北大举报，翦曾为1935至1936年的国共谈判牵线搭桥。”

王复兴 启

2016年1月16日

2. 张晓良的纠错与补充

《记忆》第147期翦伯赞怎样自杀的一文中有一误植：李杰瘦高个，应为“瘦高个”。

2016年1月17日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